# 明季瀋遼之役新探

周維強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

## 提　　要

萬曆四十七年，明軍往征努爾哈齊，卻在薩爾滸三路喪師。努爾哈齊隨後掌握主動，大舉進攻開原、鐵嶺和河東諸堡，明軍據點或被攻陷，或主動放棄，遼東防線已成潰敗之勢。薩爾滸決戰後五個月，熊廷弼於海州接替楊鎬為遼東經略，正遭逢北關陷落，牽動瀋陽潰師，軍民大舉遷往遼陽避禍，遼東局勢猶如山倒之時。熊廷弼力挽狂瀾，以遼陽為基地，犒勞軍士，懲戒將領，增援兵將武備，積極重修遼陽瀋陽等城，大造火器，布署戰車，並提出「四路戰守之策」來防守遼東，重拾明軍防禦遼東的信心。期間雖經歷遼陽火藥庫爆炸，以及金軍進攻瀋陽和奉集堡等挑戰，但他仍積極經營瀋遼，努力收復失地；歷時僅一年兩個月，挽救明軍頹勢，創造了遼東的軍事奇蹟。然而，在政爭之下，熊廷弼於泰昌元年十月黯然去職，由袁應泰繼任。天啟元年三月，努爾哈齊即發動瀋遼之役，攻下瀋陽和遼陽二城。其結果，遼河以東不復為明土，故此役實為薩爾滸之役後，金軍諸次在遼東攻勢之結果，不可以單純之城市攻防戰視之，它是明軍在遼河以東戰略經營的重要潰敗，也是努爾哈齊開國之戰。關於此役勝敗，先前學者多將瀋遼之失歸因於熊氏去職之政治因素。本文擬透過對於明清雙方史料的考察，以及如《滿洲實錄》等圖像史料的佐證，輔以繪製作戰形勢圖，重新檢視薩爾滸之役後，兩軍在遼東的攻防。並以軍事技術和戰術觀點，再次評析雙方的軍事行動，以了解兩軍在軍事上的得失。

**關鍵詞：**瀋遼之役、熊廷弼、戰車、遼東鎮

# 前　言

明末遼東局勢，因為努爾哈齊（1559-1626）的崛起而形勢丕變。萬曆四十七年（1619）的薩爾滸之役，明軍三路喪師，隨後又有開原、鐵嶺等地之失，使得遼河以東防線岌岌可危，作為遼東政治和軍事中心的遼陽和瀋陽城，逐漸成為金國的新目標。為了阻止此一不斷惡化之態勢，朝廷起用了曾任遼東巡按的熊廷弼。

熊廷弼（1573-1625），字飛白，或非白，號芝岡，江夏人。萬曆二十五年（1597），舉鄉試第一。次年（1598），成進士。自萬曆三十六年（1608）十一月起至三十九年（1611）六月，授浙江道御史，巡按遼東，凡二年又七閱月。三十九年，離開遼東，改差南直隸提督學政。四十一年（1613），因事革職回籍。四十六年（1618）十一月，陞大理寺左寺丞兼河南道監察御史，宣慰遼東。四十七年（1619）六月，擢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泰昌元年（1620）九月，回籍聽勘，改由袁應泰擔任（？-1621）經略。去職未及五個月，天啟元年（1621）三月，瀋遼即告陷落，明朝遼河以東領地盡失。[1]

熊廷弼雖在瀋遼之役前即去職，然而瀋遼之役前遼東防禦及人事布局決策，悉出其規畫。故要認識戰前明軍之軍事佈局，及戰前明與金軍之互動，必須從其奏疏深入考察。而明軍之總體行動，亦需要參考檔案官書的記載。金軍之行動，則必須考察記載清初之《滿文老檔》、《太祖實錄》及《皇清開國方略》等史書及《滿洲實錄》等圖像史料。

瀋遼之役雖速戰速決，然其經緯複雜；不但與薩爾滸之役後，金軍在遼東對明軍之逐步攻勢密切有關，且又與朝鮮、葉赫和喀爾喀蒙古和戰問題有涉，必須一體視之。以往學界對於戰役之得失，多重視政治影響，而較少深入分析軍事技術與戰術問題。故本文擬從熊廷弼擔任遼東經略期間，所遭遇金軍的軍事挑戰，及其應對之策，配合戰略和戰術分析，了解其防禦的策略。此外，亦透過對於明清雙方史料的考察，結合軍事技術和戰術觀點，輔以繪製作戰形勢圖，重新檢視瀋遼之役過程，評析雙方的軍事行動，以探析兩軍在薩爾滸之役後的年餘間，雙方在遼東戰場軍事行動的得失。

1　李光濤，《熊廷弼與遼東》（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6），頁 2。

## 一、熊廷弼巡按遼東的軍事經營

熊廷弼任遼東巡按時，即對遼東鎮戰略形勢做過精闢的分析。他在萬曆三十六年（1608）為反對遼東報羨扣餉上奏時指出：「遼為京師東控倭，北扼虜，置軍非為遼也，無遼則京師不支，無軍則遼不支，補軍非為存遼也。」說明遼東鎮防禦與京師防禦實為一體，密不可分。[2]

萬曆三十六年，他上奏描述遼東鎮形勢與防禦困難時稱：

> 臣試以遼之形勢利害與該部計之，他鎮有邊有腹，遼則夾山海而緣處其一涯，如弓背，然腹徑不過數十里，而邊長且二千三百餘里，該部以為兵少可支乎？他鎮皆一面對虜，而遼不但三面對虜，自舊遼陽失後，虜插入而巢穴其中，竟分遼為兩段，河西墜懸於東北，又各以三面對虜矣，該部以為兵少可支乎？他鎮有邊牆，遼獨與虜接壤而處，出入無時，無峻嶺重關以為限隔，該部以為兵少可支乎？[3]

說明了遼東鎮不論河東還是河西，防禦態勢都是三面受敵的窘境，加上沒有邊牆的關口阻隔，蒙古部族又雜居其間，防禦實在難上加難。

熊廷弼也對努爾哈齊和金國的戰力有所認識，他在萬曆三十七年指出：

> 奴酋生聚教訓，三十年於茲矣。其為人，譎智多謀，信賞必罰。部夷善騎射者，不難解裘以衣之，割愛以妻之。而苟一犯法，雖乳父之屬，必涕泣斬之，不少貸。以此刑賞嚴明，人人用命。……其挑選精壯，年二十五以上、四十五以下者方行編伍，非此輒汰去。而又日投石超距，以習其力，椎牛饗士，以結其心。至於打造軍器，如銃錘、劈挾，攻城之具，尤不可數計，此非無事之物也。[4]

故可知他對於努爾哈齊的領導特質，及其所部的軍事技能甚悉，其中「非無事之物」一詞更是清楚點出對於努爾哈齊野心的洞見。

---

2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11，頁 10），卷 1，〈巡按奏疏第一．除報羨餘疏〉，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3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1，〈巡按奏疏第一．除報羨餘疏〉，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頁 10。

4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2，〈巡按奏疏第二．議增河東兵馬疏〉，萬曆三十七年六月十八日，頁 94。

他也指出了遼東兵力素質低下的真相，認為「遼兵孱弱已極，精壯能幾」。他閱視各地，發現堪戰軍馬甚少；開原不及二百人，鐵嶺不過四百人，東協不過五百人，瀋陽則抽選鋒十數人。射而多不能開弓，或開弓而矢不及十步。蓋州、復州則抽火槍者三十人射打，而通計之僅中一鉛。在廣寧大營中，左右翼戰營戰兵各五百人，正兵營則不過千餘人，缺額甚大。朝廷不得不令戶部發應還太僕寺漕折銀十萬兩，太僕寺發班價銀五萬兩，南京兵部借銀八萬兩，戶工二部共七萬兩，解赴遼鎮。[5]

他也曾多次論及遼東造戰車的重要性。如在萬曆三十七年（1609）二月二十五日所奏〈務求戰守長策疏〉中稱：「平原易地，宜用輕車、火砲、火鎗之屬，又置之不講。」[6] 嚴詞批判遼東的軍備廢弛，遼東部隊對於戰車與火器茫然不知。在〈修復屯田疏〉中，為掩護遼鎮修築邊堡，除原有戰車外，再請求補造六、七百輛戰車給護工官軍，裝載火器，以防虜患。[7] 十二月十三日，在遼東增設邊牆城堡時，也「每日修築，所至環戰車為營，或立營盤，安排火器，以為家當」。[8] 這些增用戰車的做法，對遼東鎮修護邊堡的明軍提供了有效的防護力和赫阻力。

為了強化遼東鎮明軍的戰鬥力，他又與遼東總兵王威議火器營陣諸法。[9] 萬曆三十八年（1610）八月十八日，在〈懲前規後修舉本務疏〉中，則指出戰車作用在於以守為戰，應「選將練兵，大造火器戰車，以備堵截於臨時」。[10] 又說：

> 虜見吾官軍至，必解圍而合眾以衝我，我勿與浪戰也，晝則環戰車為方城，層列火器，擡營而前，直薄其壘。夜則以大砲驚擾之。虜欲掠，而吾野已清；欲戰，而吾壁已固；欲相持，而畏吾火器。存箚不住，三日不得

5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2，〈巡按奏疏第二．議增河東兵馬疏〉，萬曆三十七年六月十八日，頁 95、97。

6 （明）程開祜輯，《籌遼碩畫》，收入《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8，《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一集》景原臺北帝國大學藏明萬曆刻本，頁 4b），卷 1，頁 51。熊廷弼，〈題為遼左情勢危急乞敕當事諸臣務求戰守長策以存孤鎮事〉。（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2，〈巡按奏疏第二．論遼左危急疏〉，萬曆三十七年七月十九日，頁 63。

7 （明）程開祜輯，《籌遼碩畫》，卷 1，頁 47b-48b（73）。熊廷弼，〈題為欽奉聖諭修復屯田以助糧餉謹區畫大略乞敕當事大修邊防保民護田以圖經久之策事〉。（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2，〈巡按奏疏第二．議屯田修邊疏〉，萬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頁 112。

8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4，〈巡按奏疏第四．修邊舉劾疏〉，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頁 176。

9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4，〈巡按奏疏第四．留鎮撫疏〉，萬曆三十八年三月初一日，頁 195。

10 （明）程開祜輯，《籌遼碩畫》，卷 1，頁 56a（77）。熊廷弼，〈題為遼敝已極遼人已空謹按四十年來邊情大略再申膚見乞敕當事懲前規後修舉本務以保孑遺性命事〉。（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5，〈巡按奏疏第五．再論修屯疏〉，萬曆三十八年八月十八日，頁 237。

利，而氣奪退矣。[11]

故可知其在接任遼東經略前，在軍事上已十分倚賴戰車。熊廷弼亦曾主張以戰車應敵，「火器戰車小入小戰，大入大戰」，但其後卻被重視騎兵的政敵誣指為坐消士氣。[12]

萬曆三十八年，熊廷弼在遼陽開局造火器，並檄行各道打造，先後打造大三眼鎗六百桿，小三眼鎗二千二百一十桿，百子銃四百六十位，棍鎗二百九十桿，垂頭砲四十桿，並新造獨輪戰車三百輛。[13] 在任內完成牆壕六百八十五里，堡七座，臺九十九座。[14] 用火器、戰車、牆壕和臺堡，強化遼東鎮的防禦能力。萬曆三十九年，熊廷弼改任南直隸提督學政，調離遼東鎮。在南直隸提督學政任內，因牽連杖死諸生案，於萬曆四十一年回籍聽勘。

## 二、薩爾滸之役後的遼東危局

萬曆四十七年（1619），薩爾滸之役遼東明軍挫敗後，[15] 御史楊鶴（？-1635）進呈先前熊廷弼所刊疏稿粘揭，說明熊廷弼通曉遼事，推薦於朝。萬曆皇帝遂召熊廷弼前來。[16] 四月十二日，朝廷認為全遼人心不固，戰守區畫未周，因此酌議派遣使臣鼓勵士氣。隨後熊廷弼於江夏接到兵部差官王世臣所送到的吏部和兵部照會，通知他被起陞為為大理寺左寺丞，兼河南道監察御史，受命星夜馳赴遼東，宣慰軍民。十七日出發，至信陽時，又接到差官陳文志所送兵部照會，萬曆皇帝下令遼東總兵官由李如楨（生卒不詳）代，兵部受命速推堪任經略者，並催促熊廷弼星夜前來。熊廷弼因此每日兼馳二百餘里。五月十六日上朝，十七日謝恩。在京期間，為了不負使命，他主動與吏、兵、戶、工等部和都察院會議，以便到遼東時，得與經略、巡撫和巡按等大臣確定戰守方略。但朝廷一直遲遲不頒給勅書、關防和鈐押

11 （明）程開祜輯，《籌遼碩畫》，卷 1，頁 56b-57a（77-78）。同上疏。（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5，〈巡按奏疏第五．再論修屯疏〉，萬曆三十八年八月十八日，頁 238。

12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5，〈巡按奏疏第五．請停修屯辯府院疏〉，萬曆三十八年九月十三日，頁 244。

13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5，〈巡按奏疏第五．請停修屯辯府院疏〉，萬曆三十八年九月十三日，頁 245。

14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5，〈巡按奏疏第五．請停修屯辯府院疏〉，萬曆三十八年九月十三日，頁 242。

15 拙作，〈戰車與薩爾滸之役〉，收入白文煜主編，《清前史研究學術文集》（瀋陽：瀋陽出版社，2014），卷 1，頁 77-117。

16 （明）王在晉撰，《三朝遼事實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續修四庫全書》，冊 437，景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頁 14a），卷 1，萬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日，頁 48。

等。熊廷弼只得主動上疏請討。[17] 六月十五日，萬曆皇帝超擢熊廷弼為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又賜尚方寶劍，命他代楊鎬（？-1629）任遼東經略。[18] 但至六月下旬，勑書、關防和鈐押仍然尚未頒下，熊廷弼不得不於六月二十七日再次上疏請領。萬曆皇帝終於頒下。[19]

此時，遼東戰場已戰雲密佈。四月，察哈爾部虎墩擁眾數萬接近廣寧邊牆。（地圖 1）[20] 五月，努爾哈齊大掠鐵嶺、柴河、撫安等堡，並在撫順關外築城修寨，又在清河路增加柵濠等防禦工事。朝鮮也傳來了努爾哈齊定國號為金，稱汗，並建元天命。[21] 六月十五日，努爾哈齊擁兵數萬，從靖安堡進入，而喀爾喀部則抵達亮子河，以三萬兵力包圍鎮西堡。[22] 金軍共四萬，因大雨先遣騎兵一百襲擾瀋陽，以製造攻打瀋陽的假象。待得知開原城無雨，河水未漲，路不泥濘，決定繼續前進。金軍於十六日晨抵達開原，明軍主力布陣於四門外，城上明軍數量不多。努爾哈齊命金軍由城南向東包圍，士兵運用檔牌，打算拆毀城牆。明軍退入城中，雙方在東門反覆爭奪。原南面進攻掘城的金軍突然順利登城，使得駐紮於三城門外的明軍亟欲突圍，金軍紅巴牙喇兵截擊消滅了突圍的明軍。城破後，總兵馬林等皆死。開原南方的鐵嶺城明軍守軍出兵三千欲增援開原，金軍大貝勒代善率軍迎戰，援軍隨即退回。金軍於開原駐防三日後毀城撤出。[23]

萬曆四十七年七月，遼東河東開原鐵嶺諸城潰陷，喀爾喀五部炒花也攻克十方寺堡，[24] 京師震動，熊廷弼上疏指出：「遼左為京師肩背，欲保京師而遼鎮必不可棄；河東為遼鎮腹心，欲保遼鎮而河東必不可棄；開原為河東根柢，欲保河東而開原必不可棄。」認為應儘速恢復開原一帶。萬曆皇帝於是下令，賜劍一口，將帥以下不用命可先斬後奏，命熊廷弼星夜前往遼東。[25] 七月初五日夜，熊廷弼得到經略

17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7，〈前經略奏疏第一．宣慰請勑關防疏〉，萬曆四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頁 319-320。

18 （明）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卷 1，萬曆四十七年六月十五日，頁 17b（49）。

19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7，〈前經略奏疏第一．再請勑關防疏〉，萬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頁 310-322。

20 （明）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卷 1，萬曆四十七年四月，頁 15a（48）。

21 （明）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卷 1，萬曆四十七年五月，頁 15b（48）。

22 （明）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卷 1，萬曆四十七年六月十五日，頁 15b-16b（48-49）。原作靜安堡，誤。又《三朝遼事實錄》記為「西虜會師亮子河」，惟金軍出兵並未約同其它部族，故應為喀爾喀部趁金軍攻勢入侵。

2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注，《滿文老檔》，頁 93-94。

24 （明）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卷 1，萬曆四十七年七月，頁 18b（50）。

25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7，〈前經略奏疏第一．河東諸城潰陷疏〉，萬曆四十七年七月初五日，頁 322-326。

楊鎬的揭帖，得知遼陽萬分危急，賀世賢移駐虎皮驛，李如楨則移駐瀋陽，此一防衛態勢形同瀋陽北側和東側都已在金軍的控制之中。兵部雖然調兵一萬與熊廷弼前往遼東，但實際上僅有宣府兵一千和榆林兵二千。[26] 在倉促之中，於初七日辰時領兵，經通州前往山海關。[27]

七月十七日，熊廷弼抵達山海關，開始整頓出關兵馬。二十三日，榆林兵到，挑選馬兵四百名，而前協和東協兵則挑選四百名，於二十四日五鼓出關。[28] 二十五日，努爾哈齊從三岔堡攻鐵嶺，從寅時至辰時，鐵嶺城也告失陷。[29] 金軍進攻時，明軍鐵嶺城外城堡士兵往城內退守，但尚未進入一半，正逢金軍抵達，立即潰散。金軍樹梯執盾，攻鐵嶺城北。城中的明軍則發槍砲，射箭投石反擊，但仍不敵，被金軍攻下。由於蒙古喀爾喀五部宰賽（或譯齋賽，炒花之姪孫），亦進據鐵嶺城外，伺機而動。努爾哈齊發兵進攻，大破蒙古軍，並生擒宰賽。[30] 二十七日，熊廷弼疾馳至十三山站，得到鐵嶺淪陷的消息。經過閭陽驛時，又得到喀爾喀部三萬騎與金國圖謀進犯瀋陽和遼陽的消息。熊廷弼稍後抵達廣寧，命出關將士稍事休養一、二日，並與遼東巡撫周永春（1573-1639）會面，得到一千名馬兵護送，得以繼續東行。[31]

八月初二日，熊廷弼於海州校軍場，與原經略楊鎬交代，取得了遼東經略的關防、令旗和令牌等，成為新任遼東經略。初三日，進入遼陽城中，熊廷弼將遼陽駐軍中有馬有甲者交發總兵李如楨、賀世賢率領，分別防守瀋陽和虎皮驛一帶。而其他二至三萬士兵，其中部分為川兵，但多為沒有盔甲的步兵，且缺乏馬匹和火器，熊廷弼命令由總兵柴國柱（？-1621）加以整頓。[32] 十三日，熊廷弼認為金國即將奪取遼、瀋，而遼東的兵力不足以對抗，因此上疏稱「若非大發兵馬出關，張揚聲

26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7，〈前經略奏疏第一．急救遼陽疏〉，萬曆四十七年七月初六日，頁 327-328。

27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7，〈前經略奏疏第一．赴邊甚急疏〉，萬曆四十七年七月初七日，頁 328。

28 （明）顧秉謙等總裁，《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五十一年（1962）刊本，頁 16b），卷 584，萬曆四十七年七月丙申日（十五），頁 11156。

29 （明）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卷 1，萬曆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頁 24b（53）。

3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注，《滿文老檔》（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 103-105。

31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7，〈前經略奏疏第一．鐵嶺潰陷疏〉，萬曆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頁 330-331。

32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7，〈前經略奏疏第一．恭報代期疏〉，萬曆四十七年八月初九日，頁 331-333。

勢，以壯虛怯之膽，如何站立得住」，要求立刻增派附近軍鎮的部隊前來支援。[33] 同時，也希望朝廷同意增設監軍道二名，並調發薊鎮總兵李懷信（？-1624）和甘肅總兵祈秉忠（生卒不詳）前來，為了避免調遣而來的援遼總兵被用於其他戰線，特請鑄給征夷將軍印。[34]

除了官員的執掌外，兵器匱乏也是極為迫切的問題，遼陽城中近三萬部隊中，有盔甲器械者僅有數千人，火藥僅有四五千斤，硝黃則有數千斤。故熊廷弼奏請發內府戊字庫兵仗局各樣軍器，包括明盔三萬頂，鐵甲三萬副，腰刀二萬把，三四眼槍一萬桿，連珠等砲五千桿，佛郎機五百門，滅虜砲五百位，虎蹲砲五百位，百子銃五百門，湧珠砲五百位，鳥銃一千門，硝黃六萬斤，大小鉛彈一千二百萬個，鉛三萬斤，熟鐵十萬斤，鋼二萬斤。同時，在遼陽開局打造戰車和運糧車輛，需工匠一二千名，但當地只有二三百名，故熊廷弼著手向各地招募工匠。[35]

八月二十三日，熊廷弼展開遼東將領的人事整頓，他上疏劾李如楨十不堪，又請將開原道僉事韓原善（？-1628）移駐瀋陽，與總兵彈壓諸將，以防守瀋陽，並準備規復開原。[36] 又在都司衙門會同監軍御史陳王庭（生卒不詳），及單崇（生卒不詳）、劉國縉（生卒不詳）、閻鳴泰（1572-？）和韓原善等官員，將逃鎮之將標下右營遊擊劉遇節（？-1619）、總兵坐營中軍王捷（？-1619），和逃城之將鐵嶺遊擊王文鼎（？-1619）斬首。[37] 同時，眼見總兵以下的副將、參將、遊擊、都司、備禦、守備、中軍、千把總等官，在撫順、清河、開原和鐵嶺諸役中，陣亡五六百員，投降者百餘人，因此遼東鎮軍中缺少武將，熊廷弼為此上疏朝廷，希望調集京營、薊鎮、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山西、山東、浙江、四川、貴州、廣東和南直隸等處九十三位將領前來遼東補充。[38]

---

33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7，〈前經略奏疏第一．請發近鎮兵將疏〉，萬曆四十七年八月十三日，頁 333-334。

34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7，〈前經略奏疏第一．議置道將疏〉，萬曆四十七年八月十三日，頁 334-336。

35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7，〈前經略奏疏第一．請發軍器疏〉，萬曆四十七年八月十三日，頁 337-338。

36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7，〈前經略奏疏第一．主帥不堪疏〉，萬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頁 338-340。

37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7，〈前經略奏疏第一．遵旨斬逃將疏〉，萬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頁 340-342。

38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7，〈前經略奏疏第一．急催將材疏〉，萬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頁 342-349。

## 三、北關陷落後的形勢

萬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日晨，金軍抵達葉赫，葉赫東城人鳴螺，棄守外城，婦孺進入內山城，葉赫軍出城外迎戰。金軍主力攻打大城，東城則由四貝勒皇太極負責圍攻。金軍主力拆毀城牆，順利進入外城，稍事休息後，勸降不成，金軍遂執盾牌攻城。金軍士兵以重甲外披綿甲，盔外戴大厚棉帽，執盾牌為前列。第二列則為著輕甲而善射的士兵。由於葉赫軍放箭擲石，金軍士兵前進至城下，破壞葉赫的磚石造城牆。努爾哈齊登葉赫西城南山岡，城西和城北兩路攻城順利，城北先攻入，入城後雙方混戰，葉赫軍逐漸退入院舍之中，努爾哈齊下令不得殺戮，葉赫軍遂降。城主錦泰希貝勒自焚於高臺，東城的葉赫軍隨後亦降。[39]

八月二十一日，熊廷弼從奸細賈朝輔處得知，金國將攻取北關（葉赫部），不久即傳來北關陷落的消息。熊廷弼認為金國可能乘勝攻取遼瀋，奏稱：「遼瀋存亡只在此一兩月之內，臣無任痛哭流涕哀懇急迫之至。」催促朝廷補充將領和士兵，[40]並著手加強防務。

北關陷落帶給明朝的，除了少了一個可以制衡努爾哈齊的部族盟友外，更致命的是，它使遼東鎮官兵心理產生了新的恐懼。八月二十四日，瀋陽的部隊正在挖掘營盤，突然風聞北關陷落的消息，構工中的士兵紛紛放下工具，四處散逃，將領們無法阻止。熊廷弼聞訊後，立刻派遣開原道韓原善前往勸說，但他不願前往。又再派遣分守道閻鳴泰前往，至虎皮驛時望見逃軍南奔，也放棄勸說。晚間閻鳴泰向熊廷弼報告，諸將認為應返守遼陽，避免兵力分散，也人眾膽壯，可保萬全，但熊廷弼拂袖而去，不接受此一建議。二十七日，瀋陽官生人等又前來要求歸併遼陽。部道鎮臣劉國縉也持此議，賀世賢從虎皮驛前來，也稱軍逃將怯，瀋陽無法防守。九月初一日，鄉官洪敷教率瀋陽貢監生員等亦請還兵遼陽，而部道鎮臣亦持此議，在文武官員和地方仕紳堅持下，熊廷弼只得將軍隊撤回遼陽集中防守。[41]

為了安穩軍心，熊廷弼在九月初七至初十日間大饗官軍，共椎牛數百頭，買酒數千罈，蒸胡餅數十萬個。主力部隊回到遼陽，也使得熊廷弼得以全面檢視部隊的

3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注，《滿文老檔》，頁 108-113。

40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7，〈前經略奏疏第一．攻陷北關疏〉，萬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頁 349-350。

41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7，〈前經略奏疏第一．收集兵力固遼疏〉，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初三日，頁 354-355。

戰力，他與監軍御史陳王庭和部道鎮將單崇等至各營查驗，得知在遼陽的馬步官軍八萬名中，經總兵柴國柱、李光榮（生卒不詳）和賀世賢挑選後，僅有一萬五千餘名士兵堪戰。面對部隊的實況，熊廷弼只能繼續上疏催促朝廷補充前線的將官、兵馬和器械。[42]

熊廷弼也觀察到川將周世祿（生卒不詳）所率領的川兵「心膽齊壯，器械精利，而營伍亦安整不亂，可謂步兵之勁」。周世祿告以川兵為土漢混合編組，若全為土兵，戰力十倍於此。熊廷弼於是奏請增加二萬土兵。湖廣宣慰司兵一萬，由彭元錦（生卒不詳）親領，另調施州衛十七長官司兵三千，保靖宣慰司兵四五千，麻陽兵三千；四川永寧宣慰司馬步兵五千，由奢崇明和奢寅父子（生卒皆不詳）親領，由都司張神武（？-1621）指揮；酉陽宣撫司兵四千，由冉躍龍（生卒不詳）親領，由參將周敦吉（？-1621）指揮；石柱宣撫司兵三千，由秦氏子馬祥麟（生卒不詳）及其兄弟秦邦屏（？-1621）親領，而由參將童仲揆（？-1621）指揮。而這些土兵則計畫統由貴州副總兵陳寅（生卒不詳）或四川副總兵陳策（1553-1621）率領。[43] 同時，熊廷弼整理火器，預備專設兩營，得知雲南參將張名世「精工火器」，奏請委其專管火器營務。並調遣原喜峰路副總兵郭有光、原宣府總兵劉孔胤、原援遼總兵麻承恩等（生卒皆不詳），命其戴罪立功。[44] 使得遼東明軍步兵獲得了有力的補充。

熊廷弼深知遼瀋唇齒相依的道理，故仍令遼陽城內明軍四出，以示明軍之活躍。並由瀋陽遊擊柏世爵（生卒不詳）和蒲汎備禦所率千餘人駐守瀋陽，並密遣守備毛文龍（？-1629）預備毒藥，如金軍來，則立刻施放。賀世賢則領兵萬餘防衛虎皮驛和煙臺一帶。柴國柱和李光榮則領兵往清河撫順等要路聯絡按伏。熊廷弼又引代子河（即太子河）河水入城壕，並在城外東北和北面築壩壅水，增強遼陽城的防禦。[45]

除了來自北方和東方的金國軍事壓力，東南方的形勢也出現了危機。熊廷弼

42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7，〈前經略奏疏第一．精選援兵疏〉，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十五日，頁 356-358。

43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7，〈前經略奏疏第一．酌調土兵疏〉，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十五日，頁 360-362。

44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7，〈前經略奏疏第一．事極需人疏〉，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十五日，頁 362-363。

45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8，〈前經略奏疏第二．申明還兵情由疏〉，萬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頁 367-369。

自鎮江遊擊戴光裕（生卒不詳）得到朝鮮國於九月十五日咨呈，內稱努爾哈齊末子於七月底經過會寧、鍾城、穩城、訓城、慶源和撫夷等地。他認為「寬、靉、鎮江為遼、瀋之左臂，鎮江又為朝鮮、登、萊之咽喉，金、復、海、蓋之門戶也」。然而，鎮江寬靉清河一帶兵力不足，為恐金軍迂迴，故撥原任參將胡國臣率兵 2,950 餘名駐防鎮江，原任遊擊王平領兵 1,810 餘名，防靉陽，原任備禦湯遇時領兵 1,140 餘名防寬奠，加銜備禦佟鎮國領兵 3,130 餘名防清河。（地圖 2）並命劉國縉前往山東招募鄉民。並依照巡撫周永春所建議，命朝鮮駐軍於滿浦和昌城，補強了東南方的防禦。[46]

就在熊廷弼整理防線之際，努爾哈齊也完成了結盟蒙古喀爾喀五部的政治工作，其北方和西面的敵人都已降服和結盟。十一月初一日，金與蒙古喀爾喀五部「相盟和好，繕寫誓書」。雙方「蒙天地眷祐，願相盟好，同謀共處」。[47] 誓書中「於己未年十二月，刑白馬、烏牛，置設酒一碗、肉一碗、土一碗、血一碗、骨一碗，以誠信之言告天地」，若單方毀盟，則奪壽算、濺血、蒙土、暴骨而死。努爾哈齊完成可以專心對付明軍的戰略格局。[48]

## 四、「四路戰守之策」與戰車

萬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十日，熊廷弼親至各邊口隘口巡察，提出了規復遼東的新戰略計畫「四路戰守之策」。所謂四路，認為努爾哈齊出兵之路即明軍防守之路，分別為：東南路靉陽（今本溪東南）、南路清河（今本溪東北）、西路撫順（今撫順北）和北路柴河（今鐵嶺東）、三岔兒（撫順東北）間，此四路布置重兵，做「今日防守，他日進剿」的準備。若敵來犯，則其他各路出兵協防。（地圖 3）此外，尚以鎮江為後衛，屏障金復海蓋四衛和朝鮮。他主張「守正所以為戰也」，[49] 是以防守作為基調，待實力堅強時，再與金國決戰。他以兵十八萬，馬九萬匹為基礎，重新建立遼東關外的防禦。熊廷弼將明軍主力置於靉陽、清河、撫順和柴河、

46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8，〈前經略奏疏第二．朝鮮貢道添兵疏〉，萬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頁 370-374。

4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注，《滿文老檔》，頁 108-113。

4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注，《滿文老檔》，頁 121-122。

49 （明）顧秉謙等總裁，《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五十一年（1962）刊本，頁 7a-9b），卷 588，萬曆四十七年十一月癸卯日（二十四），頁 11263-11268。

三岔兒間四路，每路各三萬人，分為前後左右營（表一）。[50]

**表一 「四路戰守之策」各路軍分佈表**

| 各路 | 地形與戰略 | 將領 | 兵種 | 兵力 | 附註 |
|---|---|---|---|---|---|
| 靉陽（東南） | 林箐險阻。今日防守，他日進剿。 | 西南大將<br>主將 1<br>裨將 15-16 | 川、土兵 | 30,000 | 分前後左右中營 |
| 清河（南） | 山多漫坡，可騎步並進今日防守，他日進剿。 | 西北大將<br>主將 1<br>裨將 15-16 | 西北兵 | 30,000 | 分前後左右中營 |
| 撫順（西） | 山多漫坡，可騎步並進今日防守，他日進剿。 | 西北大將<br>主將 1<br>裨將 15-16 | 西北兵 | 30,000 | 分前後左右中營 |
| 柴河、三岔兒間（北） | 山多漫坡，可騎步並進今日防守，他日進剿。 | 西北大將<br>主將 1<br>裨將 15-16 | 西北兵 | 30,000 | 分前後左右中營 |
| 鎮江 | 水路之衝。南障四衛，東顧朝鮮。 | 兼用南北將<br>副總兵 1<br>裨將 7-8 員 | 兼用南北兵 | 20,000 | 半駐箚義州，半駐鎮江，夾鴨綠江守 |
| 遼陽 | 策應四路，以應外援 | | | 增兵 20,000 | |
| 海州三岔河 | 聯絡東西，以備後勁 | | | 10,000 | |
| 金復 | 防護海運，以杜南侵 | | | 10,000 | |
| 合計 | | | | 180,000 | |

資料來源：（明）顧秉謙等總裁，《明神宗實錄》，卷 588，萬曆四十七年十一月癸卯日，頁 7a-9b（11263-11268）；（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8，〈前經略奏疏第二．敬陳戰守大略疏〉，萬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十日，頁 374-377。

然而，遼東兵員的數量和素質上不盡理想。在四十八年（1620）正月，他發現騎營和車營新募的 14,100 餘名士兵「兵多孱弱，不慣弓矢，不慣火器，又無甲、無馬、無器械、無約束、無紀律」，[51] 同時，在清河方面也有大量新募士兵逃役的情況。[52] 因此。兵員的數量和質量的問題，一直沒有徹底解決。

50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8，〈前經略奏疏第二．敬陳戰守大略疏〉，頁 375。萬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十日。同時，閱視遼東邊務給事中姚宗文亦主張，除熊廷弼四路兵馬外，再增二三萬人，以為訓練策應之用。

51 （明）程開祜輯，《籌遼碩畫》，卷 37，頁 21a（444）。熊廷弼，〈題為新兵全伍脫處軍聲大損謹據實奏聞乞賜罷斥以正馭軍無術之罪並乞敕中外諸臣無靠以遼守之說以緩徵而誤殘鎮事〉。（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8，〈前經略奏疏第二．新兵全伍脫逃疏〉，萬曆四十八年正月初九日，頁 393-397。

52 （明）程開祜輯，《籌遼碩畫》，卷 37，頁 21a-28a（444-446）。熊廷弼，〈題為新兵全伍脫處軍聲大損謹據實奏聞乞賜罷斥以正馭軍無術之罪並乞敕中外諸臣無靠以遼守之說以緩徵而誤殘鎮事〉。

熊廷弼仍持續的對戰車和火砲等裝備提出需求，他利用對萬曆皇帝給予遼東盔甲、火器、鉛鐵、硝黃等項謝恩時，根據金軍的作戰方式，提出應製造雙輪戰車，並要求增發火砲的要求：

> 又言奴賊戰法，死兵在前，銳兵在後，死兵披重甲，騎雙馬衝前，前雖死，而後乃復前，莫敢退，退則銳兵從後殺之。待其衝動我陣，而後銳兵始乘其勝，一一效阿骨打、兀朮等行事，與西北虜精銳居前、老弱居後者不同，此必非我之弓矢決驟所能抵敵也。惟火器戰車一法可以禦之。頃臣發兵將砍取木植局，造雙輪戰車，約以三、四千輛為率，每車議載大砲二位，翼以步軍十人，各持火鎗輪打夾運，行則衝陣，止以立營，方為穩便。及查見發大砲不及十之二、三，而又留為城守，不得盡發軍中充用；欲行打造，又無鐵釘無匠役，而時又不待。伏乞亟敕該部會同巡視科道，將各廠局戎政府存貯大砲查發三千位，併敕薊遼總督查發薊、昌、保三鎮、四關、各府一千五百位，如數解運，立等安置戰車，以備衝突。[53]

故熊廷弼實欲在遼東建立總和為三、四千輛戰車的部隊，並從中央和地方政府存貯之 4,500 門大砲，來重新建立遼東部隊的戰力。但萬曆皇帝以京師防禦為名，只同意酌量發給。按，雙輪戰車即俞大猷（1503-1579）所創戰車，但尺寸略小（圖 1）。[54]

萬曆四十八年（1620）三月初六日，熊廷弼上奏遼東糧草罄盡，防守兩難，旦夕坐斃，請求催發接濟。[55] 三月十八日，熊廷弼與巡按陳王庭和道鎮諸臣高出等巡視遼陽城外，正當開啟濠閘時，忽然聽見城南爆炸聲，熊廷弼立刻登城觀望，發現大木巨石橫飛四墜，衝碎左右前後民房五百餘間，城垛五千餘個，懸樓三座，肅清門城樓二間，打死局匠二十餘人，死傷軍民約百人，爆炸的原因則推測為碾藥所造成，延燒已合成之八萬餘斤火藥，和四五萬斤硝黃。熊廷弼立刻向薊遼總督和遼東巡撫挪用廣寧和山海關所貯存的合成火藥，並請工部接濟淨硝四十萬斤，淨黃十萬

53 （明）顧秉謙等總裁，《明神宗實錄》，卷 590，萬曆四十八年正月壬寅日（十三），頁 7b-8a（11316-11317）。（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8，〈前經略奏疏第二．恭謝天恩疏〉，萬曆四十八年正月十三日，頁 397-399。

54 熊廷弼所造雙輪戰車車長一丈二尺，最寬為六尺，六人推車，一人掌車舵。參見（明）茅元儀，《武備志》（北京：解放軍出版社；瀋陽：遼瀋書社，1990，《中國兵書集成》景明天啟刊本），卷 106，〈陣練制〉，頁 6b（4420）。而俞大猷之車制則為車長一丈三尺五，寬八尺六寸。

55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9，〈前經略奏疏第三．糧草罄盡疏〉，萬曆四十八年三月初六日，頁 418-419。

斤。[56] 三月二十日，熊廷弼奏陳今年只有山西兵 1,900 餘名，湖廣土兵 2,900 餘名抵達遼陽。[57]

四月二十四日，熊廷弼和監軍道邢慎言（生卒不詳）隨前往瀋陽，與總兵李懷信、賀世賢修理城池，布署防守。[58] 為了解決瀋陽城城牆低矮不堪防禦的問題，同年五月，熊廷弼又將戰車用於瀋陽城的防禦，熊廷弼上奏稱：

> 瀋城大而低，身高不盈丈，餘面窄僅五六尺，其磚皆鹻蝕珊塌，可蹬而上……壕牆逼城數尺許，今填壕平牆，展開八丈，作圍城，一大營盤，每丈五地置戰車一輛，中空衛以砲手十餘人，餘寬三四丈為遊兵策應馬道，盤外浚深壕二道，壕外合抱大樹多枝枒者，交互糾結三五層，為鹿角狀。職同道鎮時時操鍤執杵，以示先勞。[59]

熊廷弼巧妙的將城外的壕填平，也推倒原來城外的壕牆，將戰車置原牆位置，每一丈五（4.7 公尺）置戰車一輛，配屬砲手十餘人，戰車與城牆間有三四丈（9.5-12.6 公尺）寬，以利預備隊支援。同時在戰車之外，又掘深壕二道，並利用壕外的樹枝，加以糾結成為類似鹿角的障礙物。因此，不止各路有車營，甚至連遼陽城都為戰車所團團包圍。而熊廷弼又督率官軍民夫，幫築自在州裏城，寬二丈餘。接著又興築遼陽城「清理城根，從壕起土，幫寬馬道五六丈作為戰場，背城面壕，以便射打」。[60]

戰前，熊廷弼為了測試瀋陽的防禦能力，特別與監軍道邢慎言前往瀋陽，遍閱壕柵，試驗戰車火砲，一連五回，萬砲齊發，聲震數十里。瀋陽兵共二萬八九千人，但堪戰者不過六七千人，其中之精銳則為賀世賢所屬家丁二三千人，除堪戰者外，其餘兵力均守城。熊廷弼認為目前遼東僅有兵馬十一萬，較之所需十八萬，尚差七萬，但由於各地送往遼東的兵馬，往往素質極差，熊廷弼表示「即再添十八

56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9，〈前經略奏疏第三．火藥全焚疏〉，萬曆四十八年三月十八日，頁 420-421。

57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9，〈前經略奏疏第三．火災如燬疏〉，萬曆四十八年三月二十日，頁 421-424。

58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9，〈前經略奏疏第三．亟補各道疏〉，萬曆四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頁 443-445。

59 （明）程開祜輯，《籌遼碩畫》，卷 43，頁 29b-30a（630）。熊廷弼，〈題為遼左將帥同盟文武和附為滅賊一大機會獨惜兵寡糧匱各道缺人不得隨心應手得當圖報以紓顧憂事〉。

60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9，〈前經略奏疏第三．亟催各道疏〉，萬曆四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頁 424-427。

萬，亦不中用」。[61] 對於補充而來的兵力感到失望至極。

七月，據兵部尚書黃嘉善（1549-1624）的奏報，出關將領中一百零一員有六十九員已經出發或到任，[62] 而兵員方面，已出發 149,655 員。[63] 基本上已經完成將領近七成，士兵超過八成的調遣。而至泰昌元年十月，[64] 熊廷弼疏言遼東防務大略時，遼陽在火器和戰車方面顯然已粗具規模：

> 自去年開鐵連陷，遼城非常破碎，士民知不可守，而謀欲先去，賊亦知不可守，而謀欲速來。今內外鞏固，壯哉一金城湯池也。……三路覆沒之後，軍無片甲，手無寸鐵，臣調宣大各匠役改造，又增造大砲數千，槍砲一、二萬，而軍中始漸有器械。採桑、削簳、買角、易觔，各鎮弓箭匠晝夜製造，而軍中始有弓矢。又調各鎮木匠，旋造雙輪戰車五千輛，每車安滅虜砲二位或三位，以至火箭、火輪之類，無所不備，而軍士始有攻守具。[65]

是故，熊廷弼在一年內，已經在遼東準備了約 5,000 輛戰車及其所需的火器，這個數量是薩爾滸之役中明軍所損失數量的五倍。如按其前疏所言，每車翼步兵十人，則當至少有車兵 50,000 人。惟其交代疏中，關於軍器所載則稍有差，僅稱造戰車

---

61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10，〈前經略奏疏第四．奴酋大舉入犯疏〉，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十四日，頁 489-498。

62 （明）顧秉謙等總裁，《明神宗實錄》，卷 596，萬曆四十八年七月丁亥日（十二），頁 6a-7b（11437-11440）。「將百一員言之，除題留六員，斥逐八員不開外，已出關閻正名等五十九員，已過京將出關達奇策等十員，已報起程葉光先等六員，未報起程陳與王等六員俱見在嚴檄催督，告病如梁國臣、魯應熊先經題參罰，馬杜勇、李承芳該撫臣查係真病，若陳九思、沈繼業者託疾規避，忠義全虧，應革去職銜永不敘用」。

63 （明）顧秉謙等總裁，《明神宗實錄》，卷 596，萬曆四十八年七月丁亥日（十二），頁 6a-7b（11437-11440）。「以援兵十八萬言之，四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以前，遼東見存兵募兵節次出關兵九萬八百一員名。十一月十九日起，四十八年七月初三日止，陸續出關兵四萬二千一百八十四員名，通十三萬二千九百四十九員名。已過京將出關兵一萬六千一百一十八員名。已報起程兵五百五十二員名」。

64 經禮部會議後，依照禮科給事中李若珪和暴謙貞等人的建議，萬曆四十八年以八月初一日為分界，前半為萬曆四十八年，自八月初一日起為泰昌元年，次年為天啟元年。（明）宋純臣監修，溫體仁等總裁，《明熹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縮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五十一年 [1962] 刊本），卷 1，泰昌元年九月庚寅日（十六），頁 27a-b（53-54）。（明）張惟賢監修，葉向高等總裁，《明光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縮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五十一年（1962）刊本，頁 1a-b），卷 3，頁 53-54。

65 （明）宋純臣監修，溫體仁等總裁，《明熹宗實錄》，卷 2，頁 1b-2a（74-75）。泰昌元年十月戊申日。（清）彭孫貽，《山中聞見錄》，收入《清入關前史料選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卷 2，〈建州〉，頁 23。（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11，〈前經略奏疏第五．人言屢至疏〉，泰昌元年十月初二日，頁 522-525。

四千二百餘，[66] 如此則至少有車兵 42,000 人。

## 五、萬曆四十八年和泰昌元年金軍的試探性進攻

五月二十日，邊降劉世功送到努爾哈齊招降明軍的榜文。[67] 而在瀋陽城修築完成後，金軍數萬人屯兵於撫順關，每日以二三千騎兵深入內地騷擾，並拏捕距離瀋陽六十里處明軍屯撥軍士。[68] 明軍加緊挑壕、樹柵、安車、置砲，逐步加強瀋陽的防禦。但不久之後，李懷信就因病離開遼東。[69] 而熊廷弼也自五月下旬起，出現吐血症狀，直至七月初，已經「病已深重，命在須臾」。萬曆皇帝勉其加意調理，以俟痊癒，不准其辭任。[70]

萬曆四十八年六月十二日夜晚，金軍萬餘，自撫順關入，直抵瀋陽（地圖 4）。[71] 另一部萬餘人，從東州地方沙地衝進入，直抵奉集堡，後續的金軍則包括了騎兵和步兵，攜帶了鉤梯和挨牌，總數共有四萬。明軍賀世賢率領騎兵至城東二十里的渾河沿岸與金軍交戰，金軍因此退卻十五里下營。柴國柱則自奉集堡往東三十里出擊，至小尖山、榆條寨與金軍相持。金軍因明軍南北截擊，故丟棄鉤梯、挨牌退兵。此役使明軍士氣為之一振，熊廷弼稱：「今且以瀋奉為常居，軍氣昌揚，人情鼓壯，漸轉漸佳，光景亦大不相同。」[72]

然而，明軍形勢逐漸不利，先是征夷總兵柴國柱病倒，接著萬曆皇帝駕崩。八

---

66 李光濤，〈奉旨交代疏〉，《熊廷弼與遼東》，頁 235。

67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9，〈前經略奏疏第三．逆榜詬侮疏〉，萬曆四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頁 441-443。

68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9，〈前經略奏疏第三．官軍勞苦乞恩慰勞疏〉，萬曆四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頁 434-437。惟《滿文老檔》僅載「五月初一日，入掠敵哨，俘獲不足一百。十八日，復掠之，獲俘三百」。參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注，《滿文老檔》，頁 145。

69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9，〈前經略奏疏第三．大將患病疏〉，萬曆四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頁 453-456。

70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9，〈前經略奏疏第三．病勢十分沉篤疏〉，萬曆四十八年七月初五日，頁 460-462。

71 《滿文老檔》僅載「（努爾哈齊）率步兵掠糧，入撫順路，直至瀋陽城外十里處，殺明兵百人，俘獲四千，掘取窖糧載歸」。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注，《滿文老檔》，頁 146。

72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9，〈前經略奏疏第三．賊夷分頭入犯疏〉，萬曆四十八年七月初十日，頁 470-474。

月初，熊廷弼得到了萬曆皇帝駕崩的消息，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持者。[73] 七月十六日，征夷總兵柴國柱在斗子谷巡察時，因積勞過度而昏迷。泰昌元年八月二十日，熊廷弼親往奉集堡看視後，奏請由李秉誠接任。[74] 次日，即接到金軍大舉出動的哨報。

泰昌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努爾哈齊率領金軍進攻明軍的懿路（鐵嶺城西南六十里，瀋陽城東北七十里）、蒲河（瀋陽城西北四十里）二城（地圖 5），因城中並無明軍，金軍獲得了百姓牛馬。稍後因明軍前來偵察，為金軍哨兵發現，努爾哈齊稱：「殺此明兵，直至瀋陽城，以擁塞其城門。」[75] 遂率兵直往瀋陽追擊。明軍將領李秉誠、趙率教（1569-1629）、鮑承先（？-1645）率兵出瀋陽城，駐在城外二十里處。因金軍大軍前來，明軍退守瀋陽城中。努爾哈齊命令三貝勒莽古爾泰（1587-1633）率兵百人追擊李秉誠和趙率教所部，直至渾河之東。左翼則派遣一旗兵追擊賀世賢、鮑承先部，直達瀋陽北門。斬首百餘級。雖然四貝勒也欲爭取進攻的機會，但大貝勒代善（1583-1648）和大臣扈爾漢（1576-1623）勸阻。金軍隨後撤軍，此役共俘獲八千。[76]

但在熊廷弼的奏報中，金軍的主要目的是攻擊瀋陽，而非蒲河和懿路。八月二十一日丑時，明軍千總孫文禮所屬哨兵吳巽口報：「達子入境，不知其數」。周守廉差報夜不收蔣孟時口報「達子從撫順入境，不知其數」。寅時，哨兵李欽也口報「達子從紅土嶺、廟兒山、長子嶺、大窪放火下營」。得到以上哨報之後，先發坐營遊擊柯汝棟，守備千總陶鑒、唐守德、欒應科、刑有功、張守才統領家丁八百餘名，往水田一帶地方應援。繼發遊擊孫慶、方承勛、馮大樑，備禦王化準、高可及等，帶領兵馬二千餘名，往蒲河大路迎敵。本鎮統領副將鮑承先、麻承宣，遊擊劉恩、李尚義，守備千把總張廷甫、王榮、葉名、牛成功、小敖八、郭良臣、張臣誥等，統領大營兵馬火器隨後迎敵。[77]

辰時，烽砲哨報，金軍分兩部，一部由撫順關入境往西，一部由撫順關入境

73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9，〈前經略奏疏第三．恭慰疏〉，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初五日，頁 476-477。

74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10，〈前經略奏疏第四．大帥風痰陡發疏〉，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十四日，頁 498-504。

7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注，《滿文老檔》，頁 152。

76 （清）阿桂、梁國治等奉敕撰，《皇清開國方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5b-6a），卷 7，天命五年八月丙寅日（二十一），頁 163。

77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10，〈前經略奏疏第四．奴酋大舉入犯疏〉，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十四日，頁 489-490。

往北。向西一部由五位頭子率領，於河南設防的遊擊祖天壽（生卒不詳）聞知烽砲後，立即統領兵馬過河北側，與預發遊擊羅萬言（生卒不詳）兵馬合營，一起往東北行進至灰山，與金軍遭遇。金軍本兵力較為優勢，但明軍奮勇鏖戰，金軍誤認為明軍尚有援軍，因此稍停戰收營，明軍亦收營。但金國瞭見明軍兵力稍遜，故又發起攻擊，雙方在東山鋪遭遇，明軍努力堵截，殺傷眾多，由降夷千總猛克多奮勇殺死酋首，金軍因失利退兵。明軍戰後依令前往大營合營。[78]

同時，瀋陽遊擊馮大樑下屬夜不收羊文雄口報「達子大營在蒲河空城左右埋伏，前有達賊四五百騎，從東山至古城臺大路迤西，行至范家屯」。先發遊擊柯汝棟、守備陶鑒等兵馬前至蒲河大路迎敵，行至二窪臺制高點，瞭見金軍布署情形，遂在蒲河城前後埋伏紮營。金軍派出三四百騎與明軍遊擊柯汝棟所部交戰，明軍繼發遊擊孫慶和方承勛亦投入戰鬥，金軍佯敗，試圖引誘明軍入伏，但明軍並未窮追，而在當地紮營。[79]

熊廷弼接到東北兩路兵馬與金軍交戰的消息，唯恐敵眾我寡，即命夜不收執拿令箭調取部隊回防，以相機戰守。隨營火器令副將麻承宣遊擊劉恩帶領，回城固守。熊廷弼率領大營兵馬前往二窪，但見金軍眾多，不宜分兵，因此回防瀋陽。抵達瀋陽不久，距城東北五六里有敵騎四五千直撲北門城壕而來，明軍城壕火砲齊發。當時，中軍副總兵朱萬良，遼陽協守副總兵尤世功，以及標左右二營參遊守備張聰、尚志宏等部已到瀋陽城下，得知金軍攻北門，砲火連天，隨即前往迎敵。兩軍僵持之際，熊廷弼自奉集堡得知消息，遂率領副將李秉誠、趙率教，參將羅一貴（？-1622），遊擊王豸、魯之由，坐營談堯德率兵馬火砲馳援，金軍見灰塵大起，遂退回灰山。後續長勇設防參遊備禦閻正名，左輔熊錦毛鳳文趙時雍，川兵遊擊周世祿、吳文傑，及廣寧遊擊馬熊等陸續抵達瀋陽。[80]

二十二日午時，蒲河備禦王化準下屬夜不收李先名口報，金軍往西行，至范家屯駐紮。本鎮選差守備徐基太、賀虎、賀熊帶領內丁五百名前往迎敵，但金軍反而返回大營。二十三日子時，大撥千總王世教哨兵吳志升口報，金軍從石碑山出境。

78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10，〈前經略奏疏第四．奴酋大舉入犯疏〉，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十四日，頁 492。

79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10，〈前經略奏疏第四．奴酋大舉入犯疏〉，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十四日，頁 490。

80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10，〈前經略奏疏第四．奴酋大舉入犯疏〉，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十四日，頁 491。

備禦王化準下屬夜不收陸萬全口報，金軍從塔兒峪出境。熊廷弼判斷，這些行動說明了金軍之目的在於攻取遼陽，熊廷弼因此通知奉集堡署事副將李秉誠，有警報必須相互應援。[81]

熊廷弼又收到瀋陽遊擊馮大樑手本，八月二十一日夜丑時，金軍自撫順邊進入，至蒲河紮營。平夷總兵賀世賢，副將尤世功，經略內丁及標下左右二營，及瀋陽等營主客官兵前往迎敵，使金軍無法深入，而轉往塔兒峪，向撫順前進。[82]

此役之後，除了人員和硬體外，熊廷弼亦極為重視訓練；泰昌元年（1620）十月二十五日，他在二疏辭辯中，曾自稱其操練的方法有特別之處。當時地方的操練，主要是合營裝塘衝打，或是由將官一一面試，每日不過三百人。熊廷弼則以千人為單位，分成四十隊，每隊二十五人，然後每隊挑出善射者五人，以一教四，自卯時教演至午時，不分騎射槍砲，每日操演七十回至一百回。[83] 如此則士兵的訓練頻率可以大幅提昇。同時，熊廷弼將善用火器之原參將張名世，委練南浙營兵，繼委督理火器等局，後接任浙兵右營，在取得練兵成效後，並助其恢復參將之職。[84] 又將管造布防於遼陽、瀋陽和奉集堡等地戰車數千餘輛的管木局原任守備文濟武升補管局都司。[85]

熊廷弼離職前，遼瀋一帶兵力已大有起色。熊廷弼初任時，遼陽僅有馬兵四五千人，川兵萬人，瀋陽戍兵萬餘人。但至泰昌元年，已有援兵募兵十三萬。從泰昌元年八月至九月，共用銀二百三十一萬，尚留有八十九萬六千兩。兵器方面除了向內庫和各邊鎮咨討之外，共打造滅虜大砲重二百斤以上者以數百位計，百斤七八十斤者以三千數百位計，百子砲以千計，三眼銃鳥銃以七千餘計，甲盔、腦包、臂手、甲樑以四萬五千餘計，戰車以四千二百餘計，槍刀銳叉以二萬四千餘計，鐵箭火箭以四十一萬餘計，弓以五千餘計。……這些充足的武器，說明了熊廷弼在遼東經略年餘的努力成果。同時，熊廷弼也在七月派遣監軍道高出前往瀋陽和

81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10，〈前經略奏疏第四．奴酋大舉入犯疏〉，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十四日，頁 491-492。

82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10，〈前經略奏疏第四．奴酋大舉入犯疏〉，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十四日，頁 492。

83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10，〈前經略奏疏第四．病臣罪深孽重疏〉，萬曆四十八年九月二十日，頁 506。

84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11，〈前經略奏疏第五．援將練兵疏〉，泰昌元年十月十二日，頁 531-533。

85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11，〈前經略奏疏第五．衝邊急缺將領疏〉，泰昌元年十月十一日，頁 533-534。

奉集堡與將領會商，預定於冬季攻下撫順。明年春天將瀋陽奉集堡等各路的兵馬六七萬人移往撫順城下，以戰車護衛，並派遣毛兵和浙兵深入寬奠靉，川、土兵則出清河，深入搗剿。[86]

熊廷弼因不願協助原戶科給事中姚宗文復職，姚宗文因此與之結怨，後得復職吏科給事中，閱視遼東，與熊廷弼之議不合，並聯合御史劉國縉等人連番攻擊熊廷弼。其後御史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等人復劾之，熊廷弼遂自請罷獲准。[87] 泰昌元年十月，熊廷弼終被解任，由山東按察司整飭永平兵備袁應泰接任遼東經略。[88] 期間，朝廷曾派遣兵科給事中朱童蒙勘熊廷弼功罪，在天啟元年（1621）閏二月，朱童蒙以「朝廷用人方急，仍議及時起用，以為勞臣任事者勸」為結論，肯定他在遼東的功績，並認為應予以重新起用。[89] 然而，在熊廷弼未及起用之前，三月，由熊廷弼費時兩年餘所建立的遼東戰車部隊，就面臨了瀋遼之役的考驗。

## 六、瀋遼之役

天命六年（1621）春二月十一日，金軍準備攻取奉集堡（瀋陽城東南四十五里）。明軍總兵李秉誠駐兵於此。努爾哈齊率貝勒大臣，分八路進軍。李秉誠出城六里迎敵，並派遣一二百人的部隊前去偵察金軍，但遭遇金軍左翼四旗兵而被擊退，金軍追至山上，山下的明軍也隨之撤退，但金軍尾隨追擊，直至城下。在明軍守城部隊發射巨砲後，金軍參將吉巴達及一卒中砲而死。努爾哈齊駐軍於城北三里的高岡之上，有士兵前來報告明軍二百人小部隊在附近活動。努爾哈齊下令貝勒大臣等率右翼兵追擊，自己則率領左翼兵留駐。追擊部隊擊敗了明軍，也發現了李秉誠主力二千餘駐紮的地點，李秉誠所部潰逃。四貝勒另外率領精銳護軍，至黃山

86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11，〈前經略奏疏第五．奉旨交代疏〉，泰昌元年十月十七日，頁 546-551。但熊在〈人言屢至疏〉中稱：「又調各鎮木匠旋造雙輪戰車五千餘輛，每車安定滅虜砲二位或三位，以至火箭、火輸、火人、火罐之類，無所不備。」參（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11，〈前經略奏疏第五．人言屢至疏〉，泰昌元年十月初二日，頁 523。

87 （清）張廷玉等總裁，《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新校本），卷 259，〈熊廷弼傳〉，頁 6693-6694。

88 （明）張惟賢監修，葉向高等總裁，《明光宗實錄》，卷 4，泰昌元年十月甲寅日（十一），頁 16a-b（117-118）。

89 （明）宋純臣監修，溫體仁等總裁，《明熹宗實錄》，卷 7，頁 16a-b（355-356）。天啟元年閏二月戊戌日（二十六）。林金樹、高壽仙著，《天啟皇帝大傳》（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4），頁 176。

（瀋陽城東南三十里）明軍副將朱萬良的駐營地，朱部退走，四貝勒追至武靖營而還。稍後金軍還師。[90] 閏二月十一日，金軍開始於薩爾滸興建小城。[91] 二十九日，薩爾滸城竣工。[92] 三月初一日，努爾哈齊命令參將沙金沿明邊置臺戍守。[93] 開始了攻擊瀋陽和遼陽戰事的序幕。

### （一）瀋陽攻防戰

三月，努爾哈齊召集貝勒大臣商議攻取瀋陽，命軍士載營柵攻具，乘舟順渾河而下（圖 6）。初十日（壬子），努爾哈齊率領水陸軍兵出發。十一日（癸丑）夜，明軍的前哨發現了在夜間移動的金軍，立刻舉烽火鳴砲，警報瀋陽。瀋陽守將賀世賢、尤世功分兵守城。[94]

明軍亦早已偵知努爾哈齊計劃攻取瀋陽，《明熹宗實錄》載：天啟元年（1621）閏二月，逃回明境的遼民就已經告訴總兵李光榮，努爾哈齊預備造戰車攻擊瀋陽的情報。[95] 三月，當山海關內援遼部隊還在山海關急於預支兵餉，遲遲不肯出動時；[96] 四日後，努爾哈齊將行軍緩慢的柵木、雲梯戰車等武器順渾河而下，[97] 金軍快速行軍，水陸並進，僅僅兩天多，在十二日上午辰時金軍就已抵達瀋陽，在城東七里設立了木城。十三日卯時，綿甲兵攜楯車前往城東，準備攻城。[98] 辰時，努爾哈齊下令以雲梯、戰車攻城。[99]《明熹宗實錄》亦載金軍「用戰車衝鋒，馬步繼之，遂圍瀋陽」。[100] 而其戰車之制，據《山中聞見錄》載，金軍所用的戰車是「用毡裹四輪車，載鉤梯」。[101] 而攻城時，金軍以「小車載土填壕，擁戰車過壕，急

90 （清）阿桂、梁國治等奉敕撰，《皇清開國方略》，卷 7，頁 6a-7a（163-164）。

9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注，《滿文老檔》，頁 164。

9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注，《滿文老檔》，頁 172。

9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注，《滿文老檔》，頁 173。

94 （清）阿桂、梁國治等奉敕撰，《皇清開國方略》，卷 7，頁 8a-b（16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注，《滿文老檔》，頁 176。

95 （明）宋純臣監修，溫體仁等總裁，《明熹宗實錄》，卷 7，天啟元年閏二月丙戌日（十四），頁 9b（342）。

96 （明）宋純臣監修，溫體仁等總裁，《明熹宗實錄》，卷 8，天啟元年三月庚戌日（初八），頁 4b-5b（374-376）。

97 （清）官修，《滿洲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景一史館藏原上書房小黃綾本），卷 6，頁 308。

9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注，《滿文老檔》，頁 176。

99 （清）官修，《滿洲實錄》，卷 6，頁 308-309。（清）希福、剛林等編，《清太祖武皇帝實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小紅綾本），卷 3，頁 33a。

100（明）宋純臣監修，溫體仁等總裁，《明熹宗實錄》，卷 8，天啟元年三月甲寅日（十二），頁 6b（378）。

101（清）彭孫貽，《山中聞見錄》，卷 3，〈建州〉，頁 29。

攻東門」。[102] 處處顯示出金軍之善用戰車發動攻擊。

不論是明清兩方的官修歷史或是私史，對於熊廷弼所構築的瀋陽城防禦評價均很高，如《滿洲實錄》記載：

> 城外有深塹，內插尖樁，上覆黍稭，以土掩之，又壕一道，於內邊樹柵木。近城復有壕二道，闊五丈，深二丈，皆有尖樁，內築攔馬墻一道，間留砲眼，排列戰車鎗砲，眾兵繞城，衛守甚嚴，城上兵亦登陴堅守。[103]

《滿文老檔》則稱：

> 明人掘塹十層，深一人許，塹底插有尖木，塹內一箭之地，復造壕一層，壕內側以一二十人始能抬起之大木為柵。柵內又掘大壕二層，寬五丈，深二丈，壕底插有尖木。壕內側排列盾車，每車置大砲二門，小砲四門，每車間隔一丈，築土為障，高至肚臍，障間設砲各五門。[104]

可見熊廷弼為了不讓攻城金軍有機會接近掘城，故而設立大量的壕塹作為物理隔絕，同時運用戰車為城外固定火力點，以便截擊攻城軍。《山中聞見錄》也稱：「廷弼掘河建閘，城之上下，密佈火器、火車，經營之周，人所不到。瀋陽、奉集、虎皮大小三城，亦復如是。」[105] 可見熊廷弼將這種防禦方式應用於瀋陽及其附近的戰略要地上。

對於瀋陽城的失陷過程，《滿文老檔》的記載十分簡短，僅「辰刻抵城，即刻攻克」。[106] 瀋陽城守將為賀世賢，原為副總兵，在戰前甫被晉升為「征夷總兵」。[107] 瀋陽戰役結束後，經略袁應泰、巡按張銓皆疏報「尤世功、賀世賢生死俱未可知」，對於瀋陽陷落的過程亦不清楚。後來賀世賢的家丁張賢向兵部尚書張鳳翼（？-1636）詳述了賀世賢陣亡的經過，由此可以探知兩軍最初在瀋陽遭遇的情形：

> 賢昔以兵部家丁往瀋陽立功，實隸賀世賢麾下。瀋陽城頗堅，城外浚壕，

---

102（清）彭孫貽，《山中聞見錄》，卷 3，〈建州〉，頁 29。

103（清）官修，《滿洲實錄》，卷 6，頁 309-310。《皇清開國方略》載壕深非二丈，而作二尺。（清）阿桂、梁國治等奉敕撰，《皇清開國方略》，卷 7，頁 9a（165）。

10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注，《滿文老檔》，頁 176。

105（清）彭孫貽，《山中聞見錄》，卷 3，〈建州〉，頁 28。

10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注，《滿文老檔》，頁 176。

107（明）宋純臣監修，溫體仁等總裁，《明熹宗實錄》，卷 7，天啟元年閏二月辛丑日（二十九），頁 21b（366）。

> 伐木為柵，埋伏火砲為固守計。奴猝至，未敢遽逼也。先以數十騎于隔壕偵探，尤世功家丁躡之，斬獲四級。世賢勇而輕，謂奴易與，遂決意出戰。張賢諫，不聽。世賢故嗜酒，次日取酒引滿，率家丁千餘出城擊奴，曰：「盡敵而反」。奴以羸卒詐敗誘我，世賢乘銳輕進，奴精騎四合，世賢且戰且卻，至瀋陽西門，身已中四矢，城中聞世賢敗，洶洶逃竄，降夷復叛，弔橋繩斷，或勸世賢走遼陽，世賢曰：「吾為大將，不能存城，何面目以見袁經略」。時張賢在側，世賢麾使速去，曰：「與我俱死無益也」。賢不忍，世賢叱之。賢走數十步，奴兵已至，圍世賢。世賢揮鐵鞭決鬬擊賊數十，中矢墜馬死，張賢回首猶隱隱望見之。云尤世功引兵至西門，欲救世賢，兵皆潰，亦力戰而死。[108]

據上文可知，因賀世賢之輕敵冒進，致使瀋陽城之防禦設施無用武之地，此與薩爾滸之役中，明軍將領輕敵冒進頗為類似。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熊廷弼在遼東大造戰車，數目達 5,000 輛，但在瀋陽一役中，賀世賢從未如熊廷弼積極督催馬兵迎敵出戰，也未令戰車積極出戰，僅僅將戰車佈防於城外，消極保衛城池而已。

跟隨尤世功出戰的家人尤定事後稟稱：

> 世功守瀋陽西南二門，計授健兒出奇兵，當斬打紅坐纛二酋長，軍聲大震，賊復併力來攻，世功督兵拒堵，賊三攻而我三勝之，始不敢攻西南二面。轉攻賀總兵信地之東北兩門，世賢失守，兵將披靡，莫可收拾，世功亟率親丁，飛援北門，與賊死鬬，殺傷奴賊甚眾，世功欲圖全城，而以奴眾我寡，親□□餘騎，轉戰殆盡，賊復攢箭以射，世功面中二矢，身中四矢三鎗，猶執鐵簡連斃十餘穿明甲驍賊。賊愈恨愈逼，蜂擁蟻趣。所騎戰馬亦被射倒，世功西向叩曰：「臣力竭矣。」而猶能步戰，罵賊不絕口，手不停揮，老奴恨甚，即令四面齊衝。世功力盡無援，隨自刎畢命。[109]

在金軍強攻下，瀋陽七萬守軍不敵，總兵賀世賢、尤世功，參將夏國卿、張綱、知州段展、同知陳柏等皆被斬於陣中。[110] 由是可知，金軍不僅在西門騎兵的交戰中佔

---

108（明）宋純臣監修，溫體仁等總裁，《明熹宗實錄》，卷 8，天啟元年三月乙卯日（十三），頁 7a-b（379-380）。

109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輯，《明清史料》（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9），乙編第一本，登錄號：201490-001，〈總兵尤世功之弟為遼瀋陷沒兄嫂等赴死殘件〉，頁 42。

110（清）官修，《滿洲實錄》，卷 6，頁 309-310。

上風，同時在稍後的東門攻城戰中，也成功的利用戰車擊敗守城的戰車部隊，在兩日之內就攻下了瀋陽城。

### （二）渾河橋之役

駐紮於皇山（黃山）的總兵陳策和參將張名世，在接到金軍攻擊瀋陽的消息後，率領川兵和浙兵趕至渾河南岸，得知瀋陽已經失守，下令部隊撤退。但裨將周敦吉認為應該進攻，稱：「我輩不能殺敵救瀋，糜餉三年，何為者！」[111] 石砫土司副總兵秦邦屏引兵先渡河，駐紮於橋北。而總兵陳策與浙兵三千駐紮於橋南。金軍在秦邦屏尚未完全渡河之際發動攻擊：

> 邦屏等營未就，奴四面攻之，將卒殊死戰，殺奴二三千人，賊卻而復前，如是者三。奴益生兵至，諸軍饑疲不支。周敦吉、秦邦屏、吳文傑、雷安民皆戰死。[112]

因此，明軍中的精銳川兵在金軍的逐次打擊下被消滅，金軍亦傷亡不少。

《滿洲實錄》明軍裝備為：「執竹杆、長鎗、大刀、利劍。鐵盔之外有棉盔，鐵甲之外有綿甲。」[113]《滿文老檔》則載：「明三營步兵未攜弓箭，據執丈五長槍及銛鋒大刀，身著盔甲，外披棉被，頭戴棉盔，其後如許，刀槍不入。」[114] 顯示明軍的防護力極佳。

金軍所記載的交戰情況如下：

> 帝見之，令右固山兵取綿甲戰車，徐進擊之。紅甲拜雅喇不待綿甲戰車至，即進戰。帝見二軍鏖戰，勝負未分。令後兵助之，遂衝入，敗其兵，追殺至渾河。盡溺死，陣斬陳策、張名世，而我國有先進戰參將布哈、遊擊朗格實爾泰戰死於陣中。[115]

可知努爾哈齊原令右固山所部取綿甲和戰車後再行進攻，但紅甲拜雅喇並未依令使用戰車，直接與陳策部交戰。兩軍難分勝負，直至努爾哈齊下令增援始獲勝。可知先發的右固山軍沒有使用戰車，而直至努爾哈齊以戰車增援，才扭轉了戰局。是役

---

111（清）張怡，魏連科點校，《玉光劍氣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 6，〈忠節〉，頁 256。
112（明）宋純臣監修，溫體仁等總裁，《明熹宗實錄》，卷 8，天啟元年三月乙卯日（十三），頁 7b（380）。
113（清）官修，《滿洲實錄》，卷 6，頁 311。
11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注，《滿文老檔》，頁 177-178。
115（清）官修，《滿洲實錄》，卷 6，頁 311-312。

金軍付出參將布哈、遊擊朗格實爾泰陣亡的代價。[116]《滿洲實錄》附戰圖〈太祖破陳策營〉繪出瀋陽之役中金軍使用戰車的情況。（圖 2）

清修史書對此戰的記載頗為混亂，陳策和張名世並未進入渾河北岸的明軍陣地，而是在南岸，卻稱陳張二將陣亡於渾河之北。同時，也將北岸的明軍川兵兵力高估為二萬人，實際渡河川兵不過三千人。

### （三）白塔鋪與渾河橋南五里之戰

在秦邦屏部川兵被消滅後，[117] 明軍守奉集堡總兵李秉誠、守武靖營總兵朱萬良、姜弼率領騎兵三萬安營於白塔鋪。明軍先派出一千騎兵偵察，與金軍雅遜所領兵二百遭遇，金軍立退，明軍以銃追擊。努爾哈齊遂命四子皇太極（1592-1643）驅趕明軍偵察騎兵，並因此發現白塔鋪的明軍主力。皇太極殺入明軍，明軍退走。金軍追擊明軍，明軍沿途陣亡約三千餘人，金軍遂收兵。[118] 至此，渾河橋南岸的步兵和車兵失去了騎兵的翼護。

渾河橋北岸的殘部退入橋南的浙兵營中，《明熹宗實錄》載其交戰過程：

> 他將走橋南入浙營，奴圍之數重。副將朱萬良、姜弼擁兵去渾河數里，觀望不前，及賊圍浙兵，始領而前，與賊遇，即披靡不支。賊廼萃力于浙兵營，初用火器擊之，殺傷相枕，火藥已盡，短兵接戰遂大敗。陳策先死，童仲揆騎而逸，副將戚金止之曰：「公何往？」遂下馬語其屬曰：「吾二人得死所矣！」與諸將袁見龍、鄧起龍、張名世皆死之，惟周世祿突圍得脫。[119]

可知金軍繼續圍攻陳策所領導的浙兵營，浙兵以火器攻擊金軍，直至火藥盡，雙方以短兵相接，浙兵營也隨之潰敗。陳策先死，童仲揆、戚金、袁見龍、鄧起龍、張名世皆死之，僅周世祿突圍得脫。

清修史書對此戰的記載則甚簡，在天色將暗之際，努爾哈齊攻擊渾河南岸的步兵。金軍以戰車衝入敵營，[120] 殺死副將董仲貴、參將張大斗等，渾河南的明軍戰車

---

116（清）官修，《滿洲實錄》，卷 6，頁 312。

117（清）官修，《滿洲實錄》，卷 6，頁 313。

118（清）官修，《滿洲實錄》，卷 6，頁 314。《滿文老檔》稱這些騎兵來自遼陽、武靖營、虎皮驛和威寧營，及三總兵官之騎兵。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注，《滿文老檔》，頁 177。

119（明）宋純臣監修，溫體仁等總裁，《明熹宗實錄》，卷 8，天啟元年三月乙卯日（十三），頁 7b（380）。

120《太祖高皇帝實錄》仍作楯車。參（清）覺羅勒德洪監修總裁，明珠等總裁，《太祖高皇帝實錄》，卷 7，天命五年三月壬子日（初十），頁 102。

營被消滅殆盡。[121] 此外，清修史書對此戰的記載亦頗為混亂，渾河南岸的浙兵係由總兵陳策統領，但《滿文老檔》記為副總兵董仲貴（實為童仲揆）所統領的明軍增援部隊，兵力則稱有步兵一萬人。《滿洲實錄》亦載「復有步兵一萬，布置戰車鎗砲，掘壕安營，用黍稭為障，以泥塗之」。而從明朝的紀錄可知，渾河南北岸的明軍各只有三千名。

努爾哈齊消滅童仲揆部，是明清交戰期間，雙方第一次在野戰中都使用戰車作戰。說明了金軍了解如何因應明軍的戰車戰術，在實戰中，金軍亦有能力以戰車戰勝明軍戰車。《滿洲實錄》繪有〈太祖破董仲貴營戰圖〉（圖 3），圖中未繪出明軍戰車，但可見金軍騎車並進，車兵亦使用鳥銃的情況。從〈太祖破策營戰圖〉和〈太祖破董仲貴營戰圖〉兩幅戰圖中可以發現，金軍使用戰車和鳥銃攻擊明軍，金軍的戰車與遼東明軍一樣使用雙輪型戰車，戰車前部的遮蔽採取模仿城牆和城垛的設計，沒有和明軍一般繪以猛獸，但可以提供車上兩名發射鳥銃的士兵完整的庇護，由兩名士兵負責推戰車，戰車後則有攜帶弓箭的騎兵和步兵。

金軍充分掌握了明軍尚未結營的機會大舉進攻，先利用局部優勢打垮川兵營，再以戰車消耗浙兵營火藥，使其失去攻擊能力，進而予以消滅，是金軍在渾河橋之役勝利的原因。

明廷對於此役川兵英勇甚為注意：

> 自奴酋發難，我兵率望風先逃，未聞有嬰其鋒者，獨此戰以萬餘人，當虜數萬，殺數千人，雖力屈而死，至今凜凜有生氣。當時亡歸殘卒有至遼陽以首功獻按臣張銓者，銓命照例給賞，卒痛哭階前，不願領賞，但願為主將報讎，義哉卒也，可以將矣。[122]

《滿文老檔》亦稱川兵為「皆係精銳兵，驍勇善戰，戰之不退」。[123] 然而，金軍在戰術和兵器的使用上，實已超過明軍，金軍最後以戰車擊潰陳策部的精銳浙兵，並未受到應有的注意。

---

121（清）官修，《滿洲實錄》，卷 6，頁 315。惟此處原誤植參將張名世之死，張已先陣亡於渾河橋之役。今據《皇清開國方略》修改。參（清）阿桂、梁國治等奉敕撰，《皇清開國方略》，卷 7，頁 10b。

122（明）宋純臣監修，溫體仁等總裁，《明熹宗實錄》，卷 8，天啟元年三月乙卯日（十三），頁 8a（381）。

12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注，《滿文老檔》，頁 177。

## （四）遼陽攻防戰

天啟元年（1621）三月，朝廷得知瀋陽失守後，遼東經略袁應泰撤下遼陽北的奉集、威寧二堡的明軍，集中防守遼陽。遼東巡按張銓為防範金軍迂迴，建議巡撫薛國用提河西之兵，移駐海州，督臣文球提山西之兵，移駐廣寧，以杜聲援，而山東、水兵從海道直抵蓋州，通州團練民兵速遣出關，更請發內帑數百萬以佐軍需。[124]

十八日，金軍發兵攻遼陽，駐軍於十里河。[125] 十九日，金軍再攻遼陽，午時金國兵抵城東南角，哨報西北武靖門外已駐有明軍。努爾哈齊領左翼兵出擊，而城內的明將總兵李懷信、侯世祿、柴國柱、姜弼、童仲魁等率兵五萬出城布陣應戰。努爾哈齊原僅命部分部隊攻擊明軍營左，並未計劃投入主力。但皇太極堅持往攻，努爾哈齊遂將二黃旗兵（正黃、鑲黃）增援皇太極。在皇太極和四固山的夾攻下，明軍被追殺六十里外的鞍山，直至黃昏明軍大潰。是夜努爾哈齊改至城南七里安營，金軍圍城駐營。[126]

二十日卯時，努爾哈齊根據遼陽城的形勢對諸將頒示作戰方略，他說：「觀繞城之水，西有閘口，可令左四固山兵掘之，東有水口，又以四固山兵塞之」。[127] 於是親率右四固山兵布戰車於城邊以防衛，令軍士以土石塞東門水口。明軍也以三萬兵出東門（平夷門），列槍砲三層，連發不已。由於西門掘城作業困難，目標改為奪橋。努爾哈齊亦決定將攻擊的主力先移往東門，當東門水口壅塞的工作完成後，立即下令綿甲軍排戰車進擊東門外的三萬明軍。部分金軍出戰車外渡壕與明軍激戰，但明軍列陣後方的騎兵率先潛逃，但步兵仍巍然不動。金軍列陣，集結精銳吶喊奮射而進，城外的明軍也敗入城中，部分明軍落入東門外的壕溝水中，金軍再一次以戰車擊敗明軍。而西門外橋樑也為金軍達爾漢侍衛所部攻下，城外明軍雖然以大量火器攻擊金軍，但仍無法阻擋攻勢，金軍遂攻下了西門。遼陽城內的監軍道牛維曜、高出、邢慎言、胡嘉棟，戶部傅國和軍民於夜間逃出城。當晚，雙方在城內交戰至天明。[128]

---

124（明）宋純臣監修，溫體仁等總裁，《明熹宗實錄》，卷 8，天啟元年三月庚申日（十八），頁 9b（384）。

12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注，《滿文老檔》，頁 178。

126（清）官修，《滿洲實錄》，卷 7，頁 319-321。《滿文老檔》稱四萬兵，參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注，《滿文老檔》，頁 178。

127（清）官修，《滿洲實錄》，卷 7，頁 322。

128（清）官修，《滿洲實錄》，卷 7，頁 324-32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注，《滿文老檔》，頁 179-180。

二十二日黎明，金軍擁戰車渡河，營於東山，明軍則陣於城東，鳴砲相距。[129]但又敗，東門遂被攻下。時經略袁應泰在城東北鎮遠樓監戰，見東門為金軍所克，遂縱火焚樓而死。分守道何廷魁與妻子投井，監軍崔儒秀自縊，總兵朱萬良、副將梁仲善、參將王豸、房承勳，遊擊李尚義、張繩武、都司徐國全、王宗盛、備禦李廷幹等皆死於亂軍之中，御史張銓被生擒，遼陽遂全為金軍所奪。[130]

《明熹宗實錄》的記載中，還可以看到這一階段的戰鬥中一些值得注意的細節：

> 先二日，奴過代子河向遼陽。經略袁應泰，巡按張銓皆登埤，應泰出城督戰，留銓居守，奴薄城，攻西門，不動。次日，應泰見奴卻易與，趣兵出戰，以家丁號虎旅軍者助之，分三隊鋒交而敗，餘卒望風奔竄，奴仍入舊營。又次日，盡銳環攻發砲，與城中砲聲相續，火藥發，川兵多死，薄暮麗譙火，賊已從小西門入，夷幟紛植矣。[131]

從明朝方面的紀錄，可以看出攻城的金軍一樣有使用火砲，明軍的火藥發生意外爆炸，因此殺傷了明軍所部川兵，使金軍得以攻入小西門。

明廷對於遼陽陷落的過程卻一直不甚清楚，天啟皇帝十分關注遼陽戰役的過程，曾諭兵部：

> 遼陽奏報：自本月二十五日稱，奴賊攻進小西門，至今再無續報，朕心時切憂慮你部，便馬上差人傳與督撫鎮將等官，多方偵探情形緩急，不時報聞，不得仍前怠玩，致誤軍機。[132]

但直至五月，遼東巡撫王化貞奏報委官杜時隆和生員祖天弼二人在遼陽所見城陷的情況：

> 有自遼陽逃回委官杜時隆，生員祖天弼等，或得之目覩或質之眾口，言其狀甚悉。三月十九日，賊薄遼陽，我兵出戰，有廣寧標兵二千直犯賊鋒，賊小卻，因我眾潰，乘之逐北數十里。有言賊大敗以去者。按臣獨為不然，與各道畫地為堅守計。次日，賊圍城，按臣督守西門，親以火箭焚賊

129（清）彭孫貽，《山中聞見錄》，卷 3，〈建州〉，頁 30。

130（清）官修，《滿洲實錄》，卷 7，頁 325-326。

131（明）宋純臣監修，溫體仁等總裁，《明熹宗實錄》，卷 8，天啟元年三月壬戌日（二十），頁 12b-15a（390-395）。

132（明）宋純臣監修，溫體仁等總裁，《明熹宗實錄》，卷 8，天啟元年三月庚午日（二十八），頁 25b-26a（416-417）。

> 車。薄暮，城頭火起，城中大擾，稱小西門已開，城中皆賊，按臣下城欲入署，從者不可，共擁去小南門後，竟回署中，比晚李永芳入見叩頭訴不得已之故。[133]

可見遼陽陷落前，張銓曾親自發射火箭來攻擊金軍的戰車。但由於城中已充斥間諜，小西門被打開後，張銓遂被叛軍所擄。

遼陽城陷後，消息尚未傳到北京時，關於遼陽城的防務，經兵部尚書崔景榮（1559-1631）等人會議，認為應在城外「樹柵、濬壕、掘營盤、列車營、備火砲」。[134] 但這些建議乏善可陳，既與城陷之時明軍防禦的方式完全相同，且主管兵部的官員對於戰術方面毫無新意。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就是與此同時，山西道御史江秉謙（1581-1626）上奏力陳熊廷弼保守危遼之功，並稱「使得安其位而展其雄抱，當不致敗壞若此」，熹宗遂下令大小九卿從公會議具奏。[135] 當朝中得知了遼陽陷落的消息，天啟皇帝就立刻同意重新起用熊廷弼為遼東經略。[136] 只是熊廷弼所辛苦建立的新防務和新戰車兵團，就在明朝將領的顢頇和奸細的滲透下，馬兵放棄主動出擊，使金軍掌握了絕對的主動。而相反的，金軍卻對於使用戰車的戰術日益熟稔精進。

---

133（明）宋純臣監修，溫體仁等總裁，《明熹宗實錄》，卷 10，天啟元年五月戊申日（初七），頁 6b-7a（496-497）。

134（明）宋純臣監修，溫體仁等總裁，《明熹宗實錄》，卷 8，天啟元年三月乙丑日（二十三），頁 16b-17a（398-399）。

135（明）宋純臣監修，溫體仁等總裁，《明熹宗實錄》，卷 8，天啟元年三月甲子日（二十二），頁 16a-b（397-398）。

136（明）宋純臣監修，溫體仁等總裁，《明熹宗實錄》，卷 8，天啟元年三月丙寅日（二十四），頁 18b（402）。

# 結　論

發生於天啟元年（1621，天命六年）三月的瀋遼之役，是金國政權在遼東站穩基礎之戰。金國經三次進攻，始取得瀋陽和遼陽，控制整個遼河以東的明朝領地。自此，明軍主力無力反攻遼東，明朝結束對於遼東二百餘年的統治，遼東自此成為滿洲入主中原前最重要的根據地，也是從部族走向國家的開始，其重要性毋庸贅述。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遼河以東之戰局，起於薩爾滸決戰，繼而開原鐵嶺及河東各堡失陷，再而瀋陽奉集之拉鋸，終於瀋遼之役。故研究瀋遼之役，不能不注意作為前哨戰之開原鐵嶺之役，金國與葉赫與喀爾喀五部之戰和，及瀋陽、奉集之膠著這一系列的變局，從歷史發展來看，萬曆四十七年二月底至天啟元年三月，亦不過僅僅兩年，因此，相關的軍事行動應視為一個整體來進行討論。

作為薩爾滸之役後，遼東戰略的規劃者，熊廷弼的處境十分艱難。他出關前，積極要求增援兵馬和籌措錢糧，然杯水車薪。抵達前，金軍續攻開原、鐵嶺和河東諸堡，這些明軍據點或被努爾哈齊所攻陷，或被明軍主動放棄，明軍遼東防線正逢潰敗之際。他到任後，又因為明朝的盟友葉赫部被消滅，瀋陽軍民爆發恐懼，不得不暫將主力撤出瀋陽，重新經營。在他堅毅的領導下，犒勞軍士，懲戒將領，增援兵將武備，積極重修遼陽瀋陽等城，大造火器，布署戰車，並提出「四路戰守之策」來防守遼東。期間雖經歷了遼陽火藥庫爆炸，以及金軍進攻瀋陽和奉集堡等挑戰，但他仍積極經營瀋遼，圖謀收復遼東失地，在僅僅歷時一年兩個月，創造了遼東的軍事奇蹟。逐漸形成以瀋陽和遼陽為主的新防線。

從戰略的觀點言，熊廷弼的四路戰守，仍延續了明朝先前的搗巢作戰。他期盼能夠回復到到薩爾滸戰前的對峙形勢，透過固守與金國領域接壤關口，並集中屯兵，來達到壓迫金國的目的，並進一步尋求消滅努爾哈齊的機會。不幸的是，他無法眼見此一戰略的執行。且隱藏在這個競爭之後的決定性因素之一，是雙方的補給線遠近差異極大。在金軍積極騷擾掠取人口和糧食之下，明軍無法充分就地徵用遼兵和調取糧食，而需遠自京師和各邊調取人力物力，說明了遼東鎮軍事準備匱乏，軍政和民政長期廢弛的情形。明朝需要耗時遠途的運送人才和官兵錢糧，而金國則佔盡地利之便，不斷將指揮中心前移，雙方僵持愈久，後勤線較短舫一方優勢愈大，明軍劣勢不言自明。熊廷弼雖然不斷地向萬曆皇帝及各部衙門索要兵馬錢糧，並避免增援的官兵因為逃亡，或是改調而成為虛數。同時也積極的調撥工匠前來遼東，

打造戰車和火砲，力求自給自足。終究不能夠在長期的戰爭中，獲得關鍵的優勢。

從戰術的觀點言，明軍沿襲傳統，在野戰上擁有車兵、馬兵和步兵，在守城則十分仰賴火砲。但事實上，由於軍隊素質的劣化，專司主動迎敵的馬兵，不但馬兵來源仰賴西北，也缺乏足夠的馬匹，打擊能力完全無法與滿洲鐵騎一爭長短。而步兵和車兵因為操作鳥銃等火器，需要充分的訓練，也需要有充分的火藥供應，但遼東士兵的素質低下，不堪訓練，因此，步戰必須仰賴跋涉數千里的川兵與浙兵。明軍的步兵既缺乏足夠的馬兵翼護，又未在野戰上充分利用大量製造的戰車，又未攜帶投射率較高的弓箭，僅有重甲和長槍，只能近距離的攻擊金軍。同時，這些千里而來的精銳步兵，又屢次被單獨投入，或被金軍洞悉作戰意圖，在與其他部隊合營前，即施予優勢兵力持續打擊，使其未能結合其他的兵種，因而被逐次浪擲在遼東沙場之上。繼任者袁應泰，並未發揮戰車和火砲應有的打擊能力。倘熊廷弼尚在遼東，則明軍之敗局尚屬未定。

而戰前遼陽火藥庫的爆炸，也預示著仰賴火器的明軍，在火藥的保護上必須額外注意，以免被金國的奸細所滲透和破壞。萬曆四十八年金國攻擊奉堡、瀋陽集之役，事實上是天啟元年三月的瀋遼之役的前哨戰，金軍吸取了經驗和教訓，利用戰車來進行攻城和渡過壕溝，甚至能在野戰中學習明軍使用戰車，並戰勝明軍戰車。同時，在薩爾滸之役中得知，明軍戰車採取攻勢無法抵擋滿洲鐵騎的衝擊，瀋遼之役則證明了明軍在守勢作戰中亦無法以戰車取勝。

努爾哈齊的成功並非偶然，他沒有乘勝在薩爾滸之役後，立刻攻擊瀋陽，說明了他沉穩的戰略視野。他選擇先打擊開原和鐵嶺，以阻斷明軍在其進攻瀋陽時南北夾擊的可能。同時，他攻滅葉赫部，並逼迫蒙古喀爾喀五部結盟，使得這些部族無以坐分金軍勝利的果實。

在戰術上，努爾哈齊有效地發揮了滿洲騎兵騎射的打擊力優長，並主動偵察，掌握戰場主動。但值得注意的是，金軍也掌握了攻城術和火器等戰術，這些戰術的多樣性，使得金軍得以在較短的時間內取得勝利，避免不必要的僵持與消耗，並大大的保存了己方的實力。同時，他將部隊主力從赫圖阿拉逐步遷往界繁和薩爾滸，有效的拉近金軍主力與瀋陽的距離。極大的節省了金軍行軍的距離，確保戰鬥力的維持，與後勤的便利。同時，金軍利用己方騎射在野戰上的優勢，多次試圖引誘明軍，集中主力，以發揮各個擊破和圍點打援的戰術。

天命六年（天啟元年，1621）四月，努爾哈齊即從興京遷都遼陽，是為東京。天命十年（1625），再自遼陽遷都瀋陽。十一年（1626），皇太極即位，著手對瀋陽進行擴建，至天聰八年（1634），將瀋陽定名為盛京，瀋遼成為清入關前的政治和軍事中心。因此，瀋遼之役的重要性實不亞於薩爾滸之役。

〔後記〕本文原發表於瀋陽故宮博物院舉辦之「清前史研究中心成立暨紀念盛京定名三百八十周年學術研討會」（瀋陽：瀋陽故宮博物院，2014 年 9 月 11 日至 12 日），感謝會中劉璐教授、本刊兩位匿名審查人和陳龍貴先生給予意見和指正。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明）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續修四庫全書》，冊437，景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明）宋純臣監修，溫體仁等總裁，《明熹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縮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五十一年（1962）刊本。

（明）茅元儀，《武備志》，北京：解放軍出版社；瀋陽：遼瀋書社，1990，《中國兵書集成》景明天啟刊本。

（明）張惟賢監修，葉向高等總裁，《明光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縮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五十一年（1962）刊本。

（明）程開祜輯，《籌遼碩畫》，收入《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8，《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一集》景原臺北帝國大學藏明萬曆刻本。

（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11。

（明）顧秉謙等總裁，《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五十一年（1962）刊本。

（清）希福、剛林等編，《清太祖武皇帝實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小紅綾本。

（清）官修，《滿洲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景一史館藏原上書房小黃綾本。

（清）阿桂、梁國治等奉敕撰，《皇清開國方略》，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乾隆間文淵閣四庫全書寫本。

（清）張廷玉等總裁，《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新校本。

（清）張怡，魏連科點校，《玉光劍氣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

（清）彭孫貽，《山中聞見錄》，收入《清入關前史料選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

（清）覺羅勒德洪監修總裁，明珠等總裁，《太祖高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清實錄》，景一史館小黃綾、大紅綾本及遼檔大紅綾本。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注，《滿文老檔》，北京：中華書局，1990。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9。

## 二、近代論著

李光濤，《熊廷弼與遼東》，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6。

林金樹、高壽仙，《天啟皇帝大傳》，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4。

周維強，〈戰車與薩爾滸之役〉，收入白文煜主編，《清前史研究學術文集（卷一）》，瀋陽：瀋陽出版社，2014，頁 77-117。

范中義等，《中國軍事通史．明代軍事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

孫文良、李治亭，《明清戰爭史略》，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 A New Investigation into the Battles of Shenyang and Liaoyang

Zhou Weiqiang
Department of Rare Book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 Abstract

In 1619, Ming troops attacked Nurhaci's Jurchen forces and were defeated three out of four fronts at Sarhu. Afterwards, Nurhaci took the initiative and launched a major counter-offensive against Ming fortifications at Kaiyuan, Tieling, and Hedong. These Ming strongholds were either conquered or abandoned, and the Liaodong defense was about to collapse. Five months after the Battle at Sarhu, Xiong Tingbi relieved Yang Hao as Military Commissioner of Liaodong. It was a time when Beiguan (North Pass) was lost, and the Shenyang army and civilians were relocated to Liaoyang to save their lives. Xiong Tingbi used Liaoyang as his base to fight back. He rewarded soldiers, and he punished officers who had caused the failure. He rebuilt the troops, weapons and city walls of Liaoyang and Shenyang. He also manufactured a great number of firearms and deployed battlewagons. Then he presented the "Strategy to Defend the Four Routes" to rebuild his troops' morale. Despite explosions at the Liaoyang munitions warehouse and attacks by Jin troops on Shenyang and Fengji Fortress, he continued to prepare for the fight at Shenyang and Liaoyang. Within a short span of 14 months, he was able to turn the tide for the Ming army and created a miraculous recovery of Liaodong. However, due to political struggle, Xiong Tingbi was relieved of his post late in 1620 and replaced by Yuan Yingtai. In the third lunar month of the following year, Nurhaci launched an attack on the cities of Shenyang and Liaoyang. The result was the loss of lands east of the Liao River. After the Battle of Sarhu, attacks by Jin armies could not be seen as just siege warfare but as a major loss of Ming's strategic assets east of the Liao River. This battle marks the beginning of Nurhaci's victories. Concerning the loss of the battle, past scholars often cited the politics behind Xiong's replacement as the culprit for the loss of Shenyang and Liaoyang. This study, however, seeks evidence from the official historie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s well as pictorial evidence from *Manchu Veritable Records*, with their battle depictions, to reexamine the military situation of

both armies in Liaodong after the Battle of Sarhu. Furtherm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tactics, an effort is made to reexamine both armies' operations to evaluate their military decisions.

**Keywords:** Battles of Shenyang and Liaoyang, Xiong Tingbi, Battlewagons, Liaodong zh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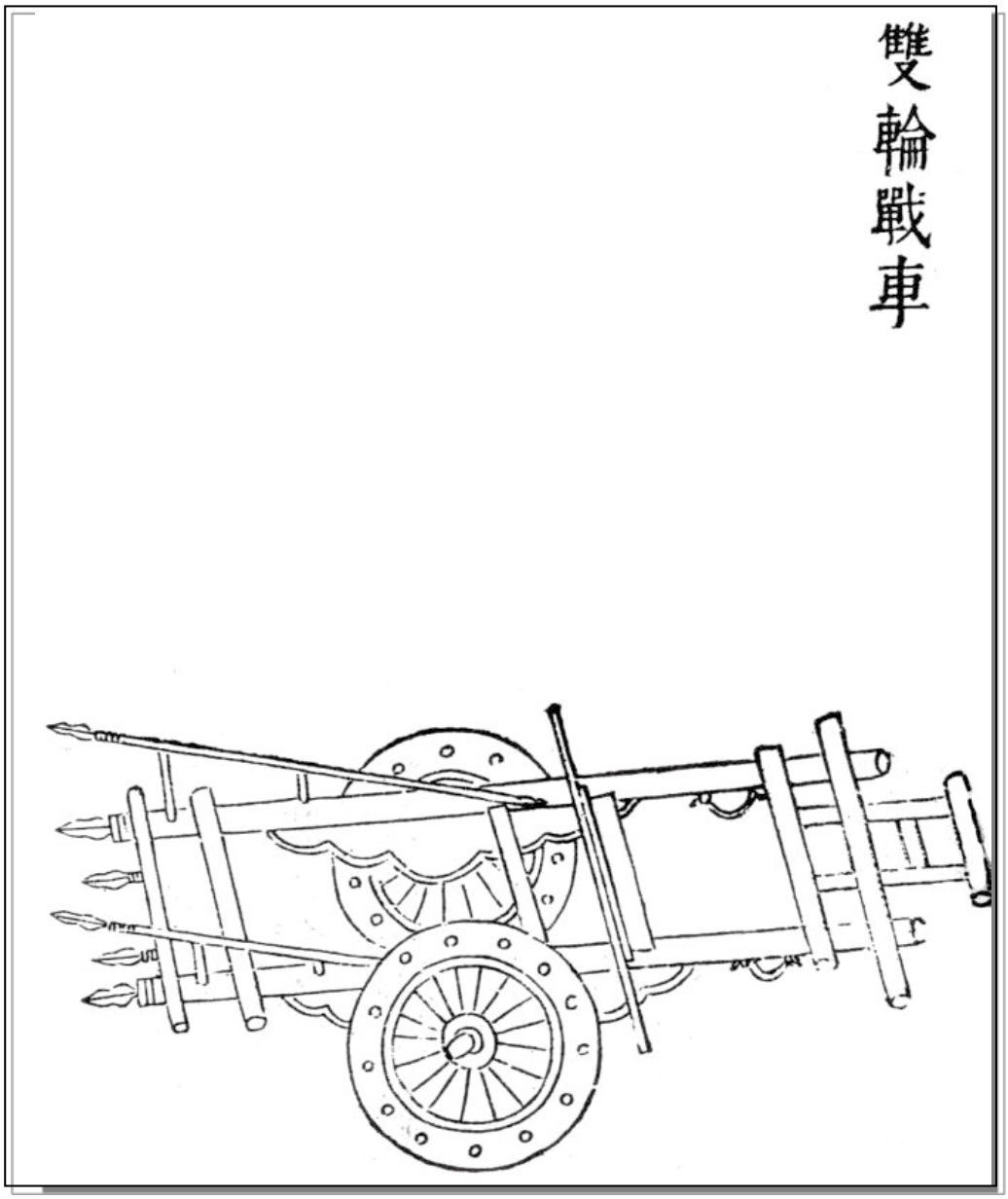



圖 1　雙輪戰車　取自《武備志》，卷 106，〈陣練制〉，頁 6a(44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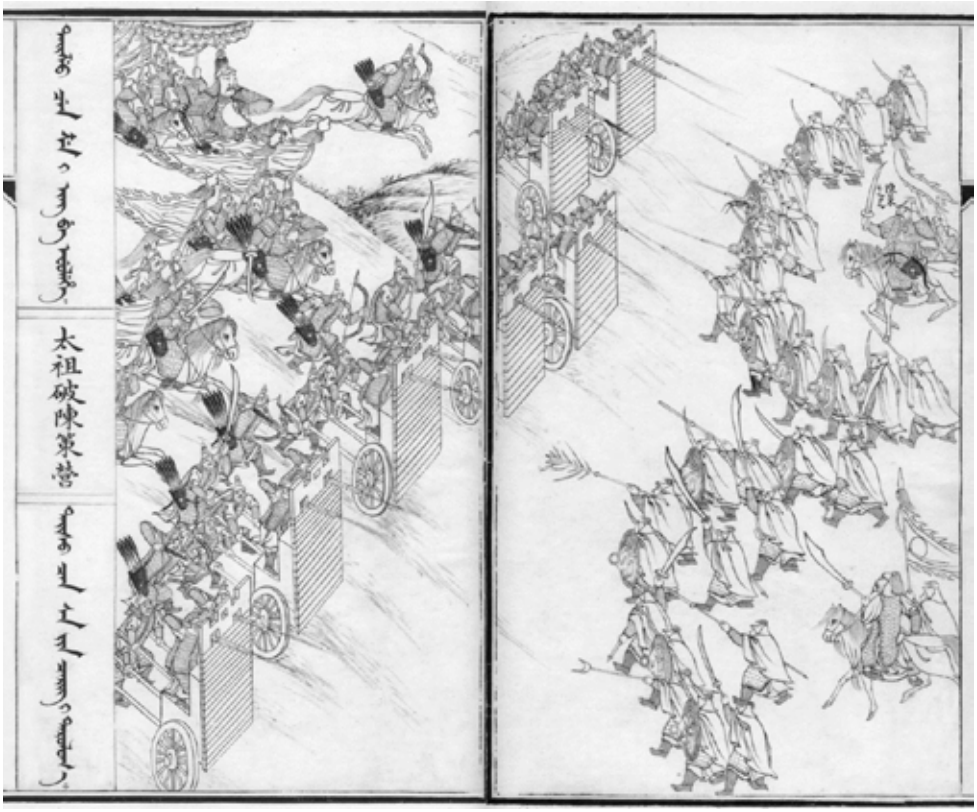



圖 2　太祖破陳策營戰圖　取自《滿洲實錄》，卷 5，頁 235。文獻上雖未記載，但此圖上金軍有使用鳥銃，每輛戰車都配有二門鳥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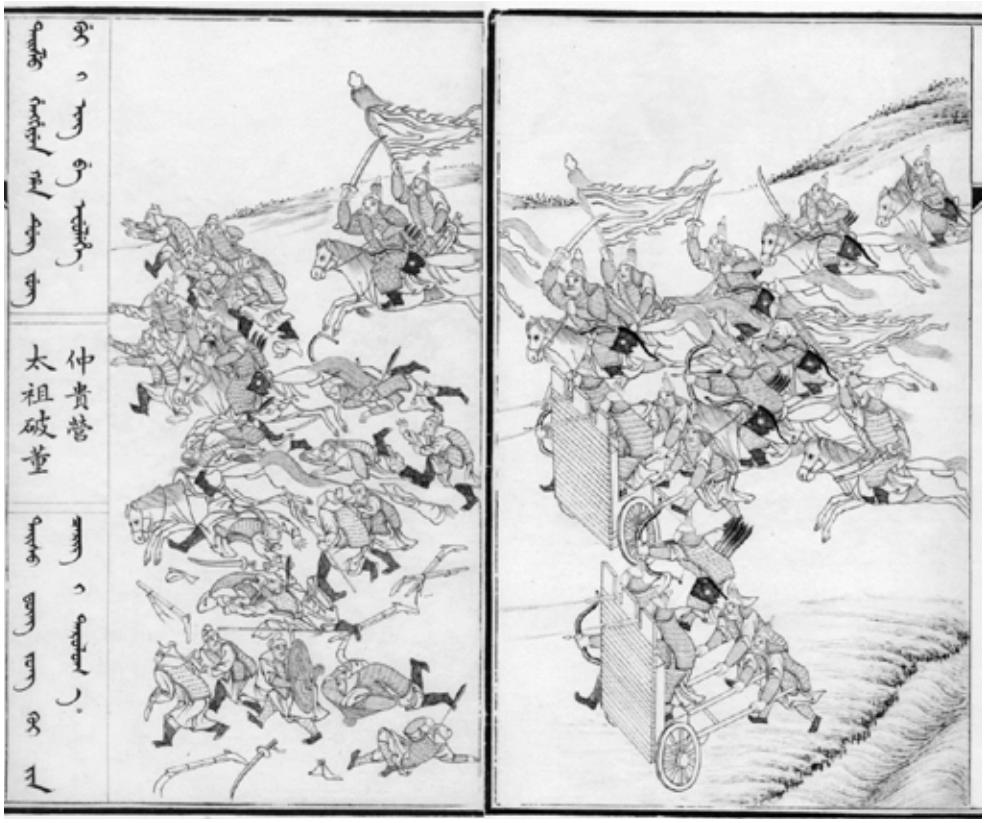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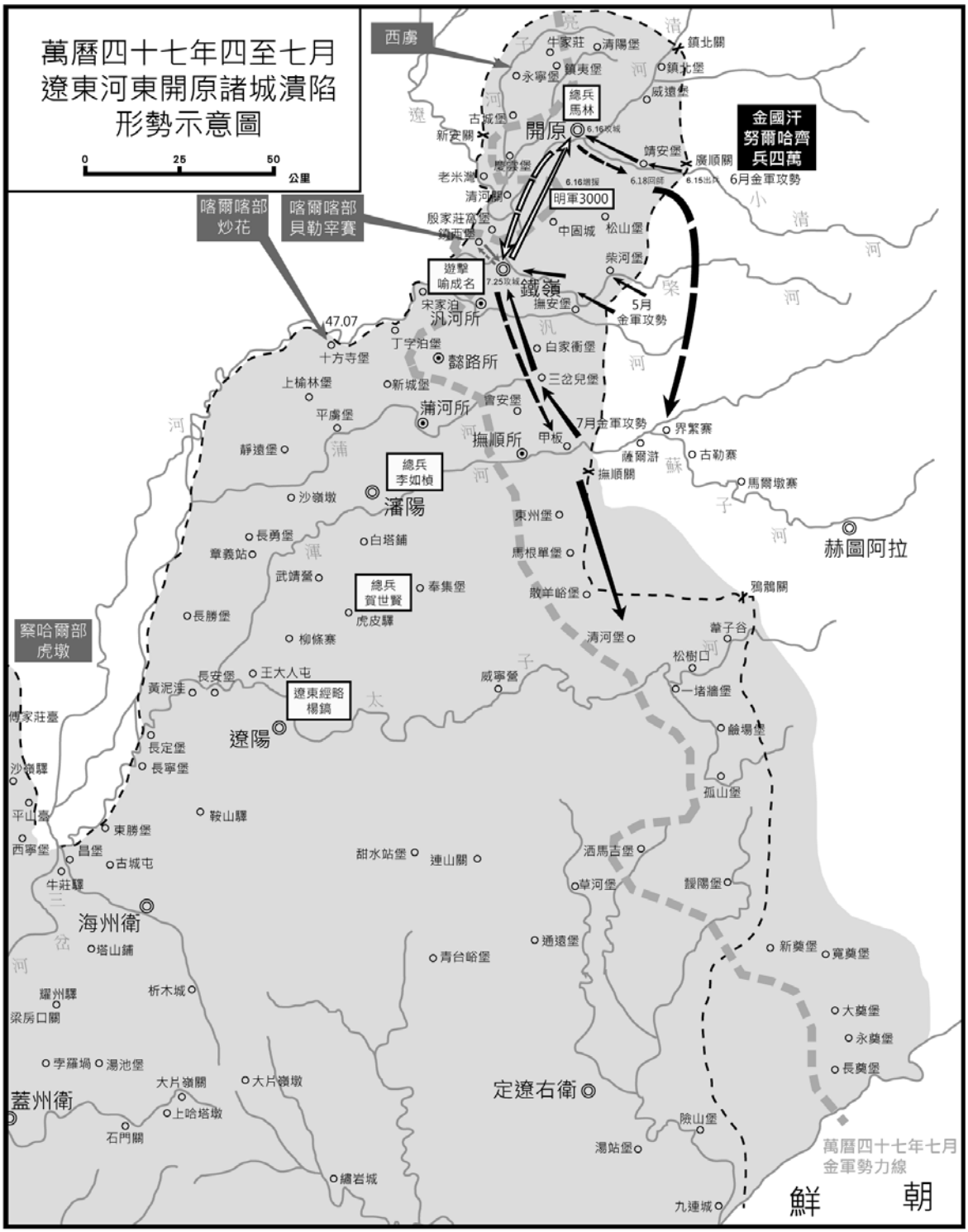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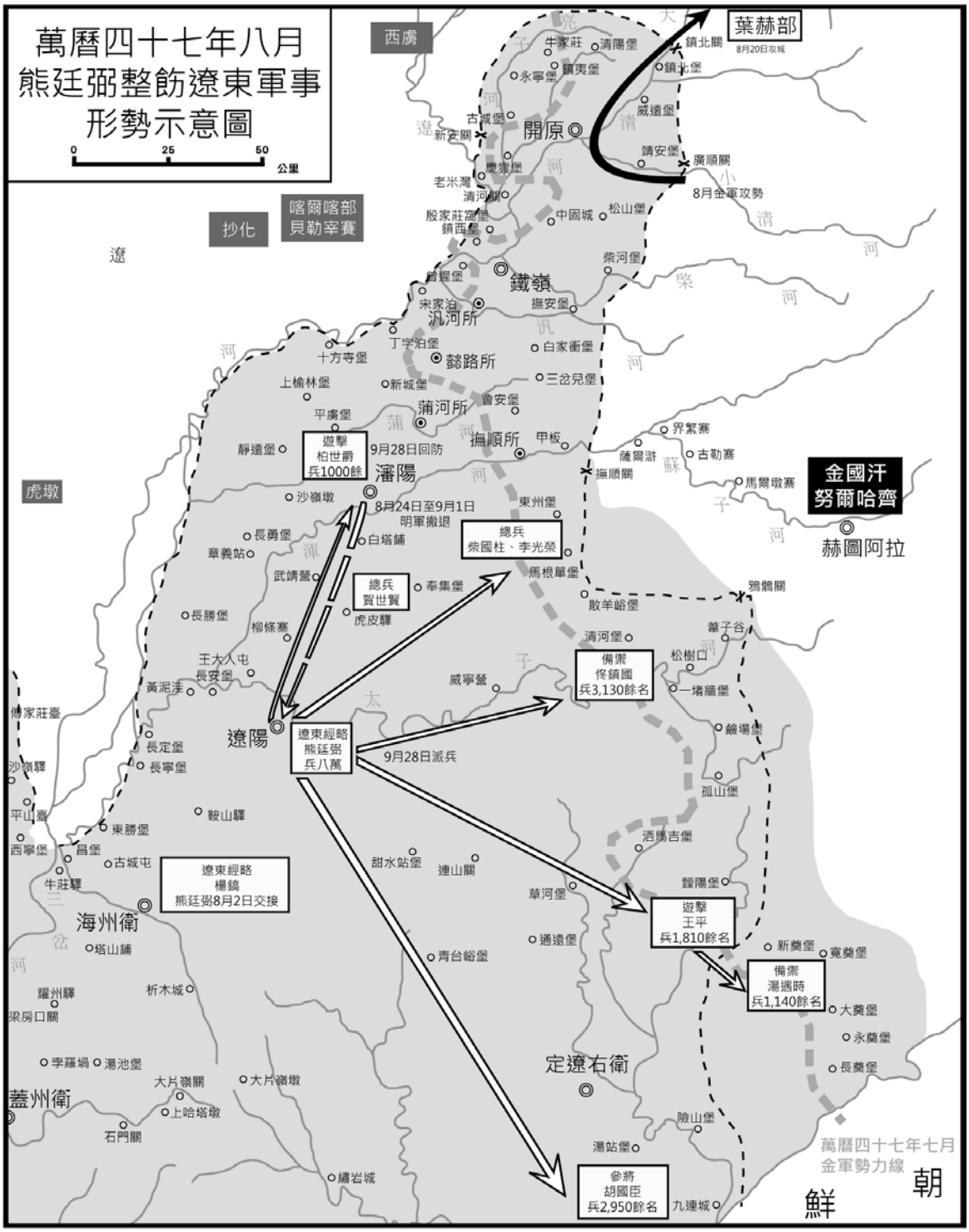



圖 3　太祖破董仲貴營戰圖　取自《滿洲實錄》，卷 6，頁 3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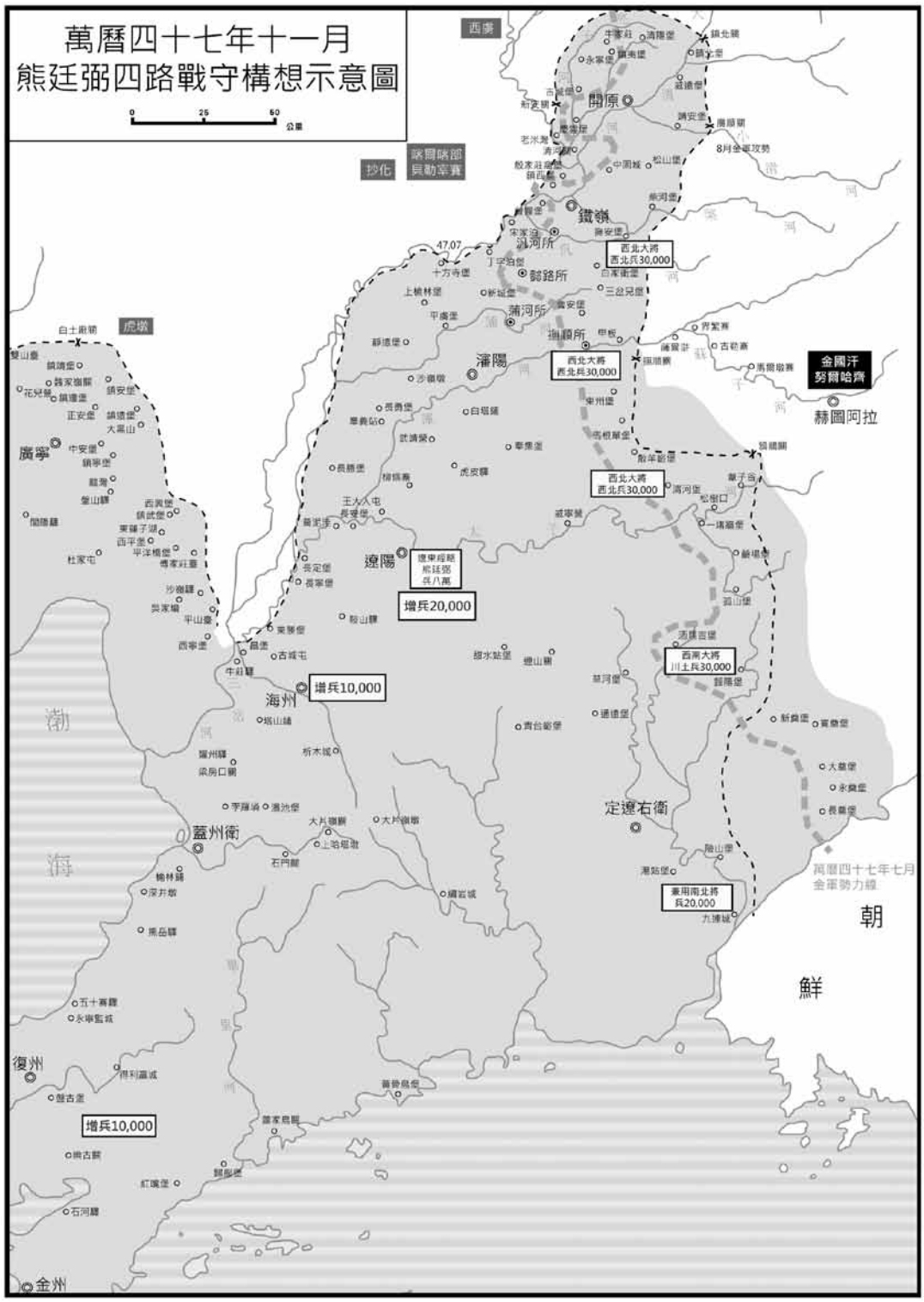



地圖 1　萬曆四十七年四至七月遼東河東開原諸城潰陷形勢圖

資料來源：（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7，〈前經略奏疏第一．河東諸城潰陷疏〉，萬曆四十七年七月初五日，頁 322-3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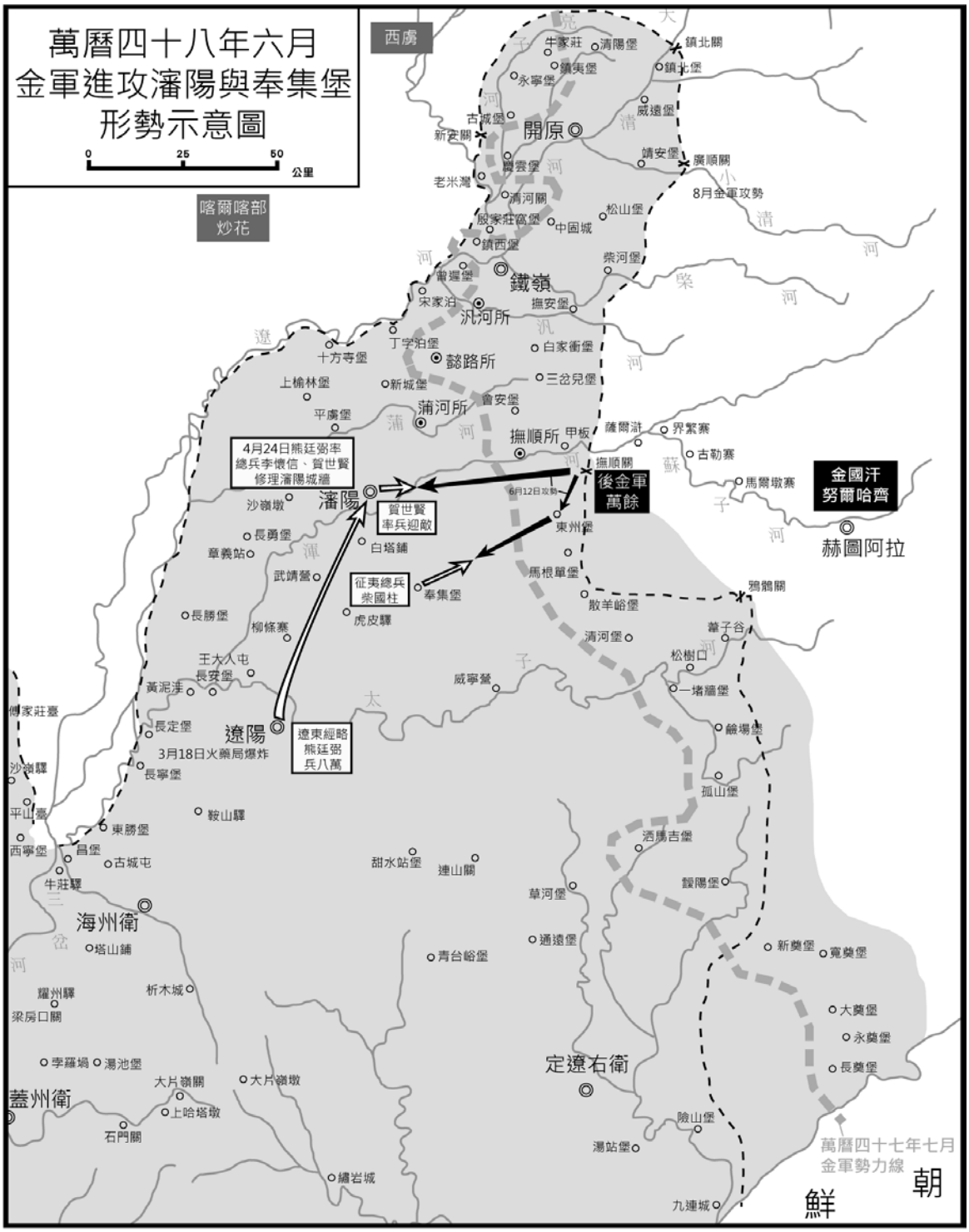



地圖 2 萬曆四十七年八月熊廷弼整飭遼東軍事形勢示意圖
資料來源：（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8，〈前經略奏疏第二．朝鮮貢道添兵疏〉，萬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頁 370-3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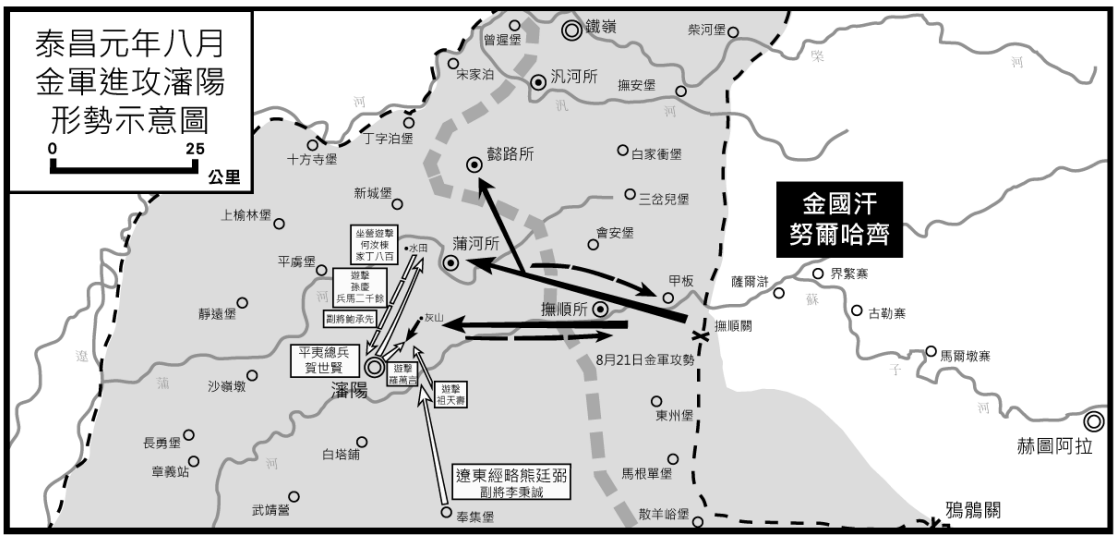

地圖 3　萬曆四十七年十一月熊廷弼四路戰守構想示意圖

資料來源：（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8，〈前經略奏疏第二‧敬陳戰守大略疏〉，萬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十日，頁 3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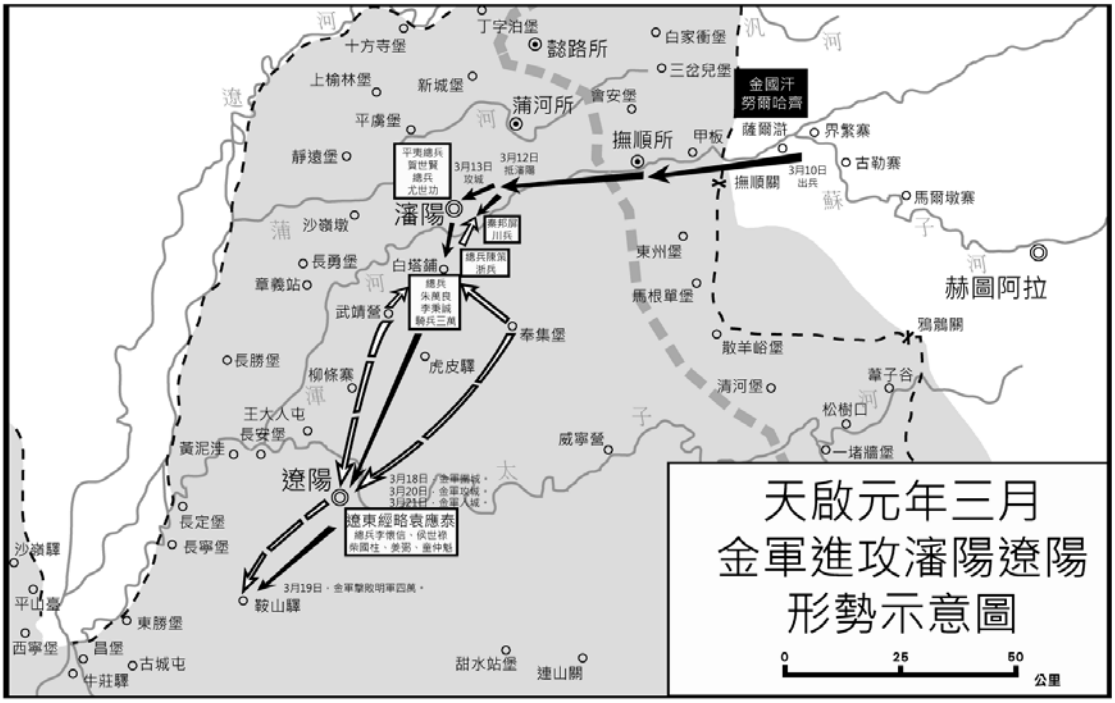



地圖 4 萬曆四十八年六月金軍進攻瀋陽與奉集堡形勢示意圖

資料來源：（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9，〈前經略奏疏第三．賊夷分頭入犯疏〉，萬曆四十八年七月初十日，頁 470-474。




地圖 5　泰昌元年八月金軍進攻瀋陽與奉集堡形勢示意圖
資料來源：（明）熊廷弼撰；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卷 10，〈前經略奏疏第四．奴酋大舉入犯疏〉，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十四日，頁 490。




地圖 6　天啟元年三月瀋遼之役形勢示意圖
資料來源：據《明熹宗實錄》、《滿文老檔》、《皇清開國方略》等記載繪製。